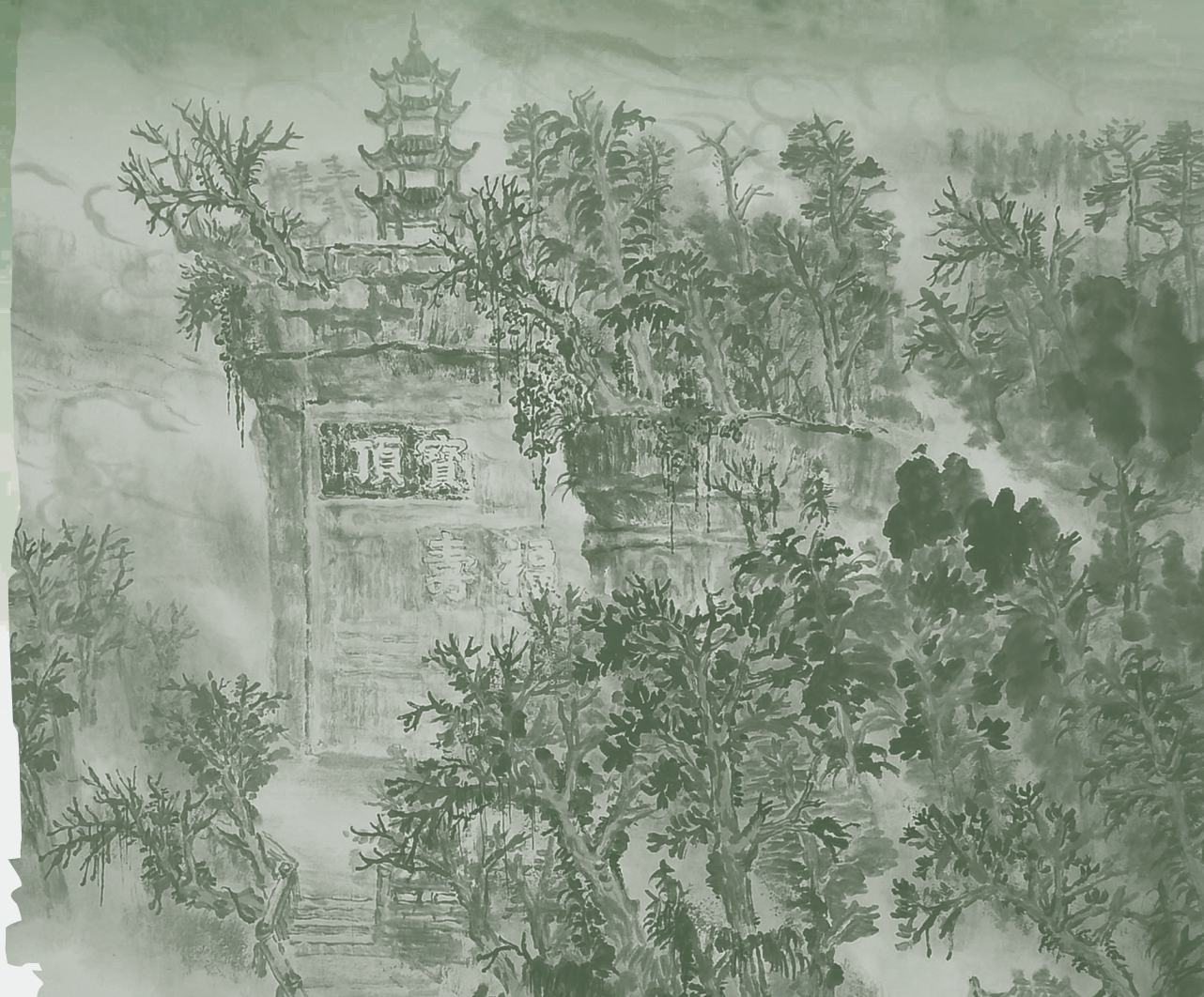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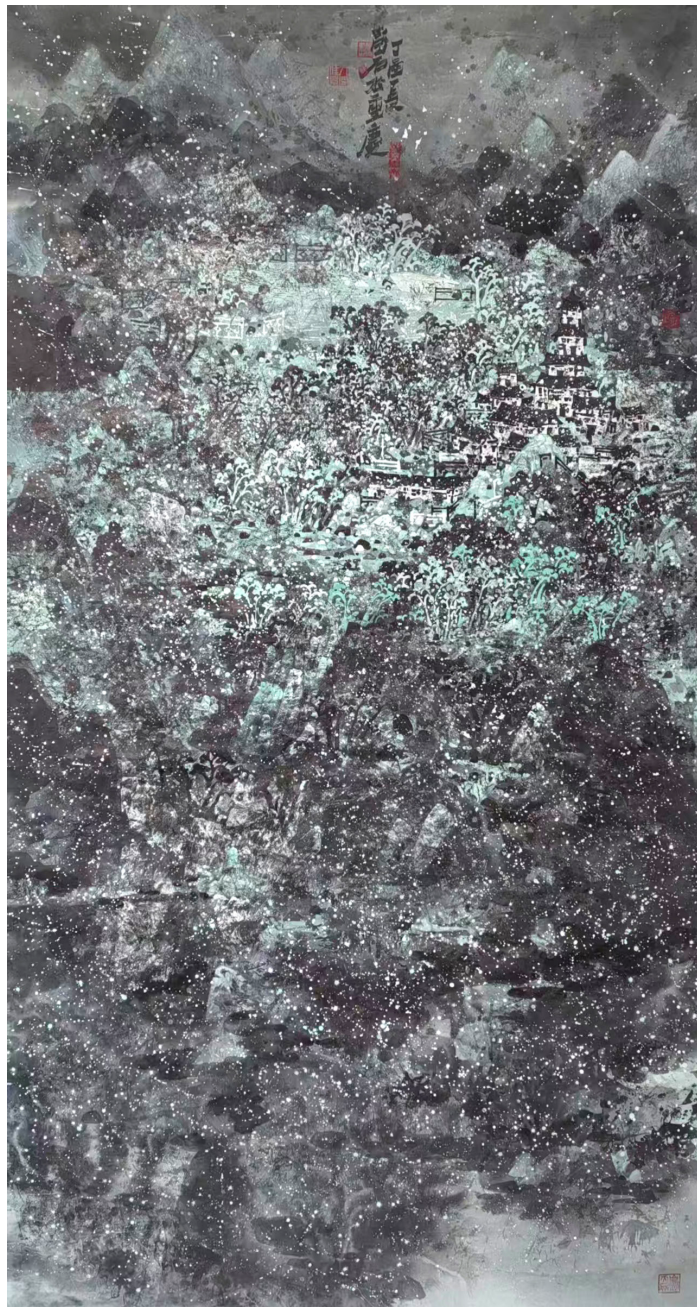
重慶 民盟

2026 季刊 

CHONGQINGMINMENG 2026.1 JIKAN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员会主办 总第 364 期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彭石 / 《巴山渝水入梦来》 / 国画 / 180 × 96cm



彭石，生于重庆。毕业于重庆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重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重庆文联委员，重庆国学书画院副院长，重庆书画社顾问。先后任《国画经典》杂志副主编，重庆梦斋艺术创作中心常务副院长，重庆红岩书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协十届美代会代表等。

传承，是最好的致敬

□石 辉

清明雨细，草木含思，天地间漫溢着肃穆而深沉的气息。《重庆民盟》以四期篇幅，追怀盟员烈士牺牲之壮举，嘱我为文。我迟迟不敢落笔，唯恐文字太轻，载不动那沉甸甸的英魂；又不能不写，因为有些名字，若无人再念，便真的消逝于时间深处。于是，在纷纷春雨中，我试着将心中的敬意与追思，化作纸上的墨痕。

翻开民盟八十余载的厚重史册，一行行用鲜血写就的名字灿若星辰。他们从书斋走向战场，从课堂奔向刑场；他们中有学识渊博的教授，有风华正茂的学生，有笔锋如剑的记者，有舍生取义的斗士。当黎明前的黑暗最为浓重之时，他们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而立、携手赴死。杜斌丞殉难于西安玉祥门外，李公朴、闻一多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黄竞武惨死于上海解放前，何雪松、刘国鋳、陈然、蔡梦慰等二十八位盟员血洒重庆歌乐山下……从西安到昆明，从上海到重庆，民盟烈士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赤子情怀，用热血铸就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信仰丰碑。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者，国之干；英烈气，民族魂。每一段英雄故事，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每一位烈士的名字，都是镌刻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朽航标。他们含笑牺牲时所期盼的，是后代子孙能够自由呼吸的晴朗天空。今天，当我们行走在繁华的街巷、安享于和平的岁月，怎能忘记——这盛世，正是他们用青春和头颅换来的黎明。

时值清明，每一次缅怀，都是精神的洗礼；每一次致敬，都是信念的传承。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英雄气不是尘封的文物，而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力量。它召唤我们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在急难险重前挺身而出，在大是大非中立场如磐。把英烈精神内化于心，就是将那份对祖国的至爱、对人民的深情，化作每一天的具体行动；就是跳出“小我”的方寸天地，融入民族复兴的浩荡洪流；就是在时代激流中增强历史主动，不待扬鞭自奋蹄，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青山依旧，忠骨无言。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民盟先贤，他们的名字并未随岁月风化，反而在一代代人的传诵中愈发清晰。我忽然明白，文字虽轻，只要有人写、有人读、有人记，便能承得住英魂的重量；名字虽远，只要有人念、有人学、有人行，便不会消逝于时间深处。这四期组稿，或许就是一次集体的“念”与“行”——让纸上的墨痕，化作心里的烙印。

雨还在下，纸短情长。我将笔轻轻搁下，窗外的草木似乎比方才更绿了些。那些先贤若有知，或许不在意我们写了什么，而在意我们做了什么。唯愿这卷首语不是一篇应景之文，而是一粒种子，落在每一位盟员的心田里，在清明雨后，生根、发芽，长成我们日复一日的践行。

草木有思，传承是最好的致敬。



喻志全 沈钧儒《秋光一隅》联
书法 180x46cmx2

主管主办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员会

编委会

主 任 蒙格丽

副主任 李朝林

委 员 张 涌 洪满斌 程建洪 石 辉 阳亚莉 李 欣

主 编 黄晓彦

责任编辑 万儒易 余 鲲 李佳龙 李 青 陈世广 钱 昀

郭 琳 周大全

编辑出版 《重庆民盟》编辑部

出版日期 2026 年 3 月 15 日

地 址 重庆市渝中区沧白路 71 号（民主党派大楼）

邮政编码 400010

电话 / 传真 023-63846787 / 63728653

邮 箱 19943321@qq.com

网 址 www.cqmm.org.cn

准印证号 渝内字第 629 号

印 刷 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

目 录

盟史回眸

- 血沃西北：民盟西北总支部英烈概述 / 钱昀 整理 4
- 李公朴：把教育做成民主的行动 / 姜 媛 14
- 潘序伦在重庆办学的岁月 / 程道江 18
- 《光明报》（旬刊）复刊纪略 / 迟云平 21

寻 踪

- 沧白堂的先生们 / 余 鲲 23
- 挺进者陈然 / 黄真彦 25

名 家

- 民盟薪火·代有英才 / 郭 琳 / 主持 撰文 27
- 书法大家魏宇平，诗书为翼流芬民间 28
- “天风琴人”张孟虚，“槐庵”操缦抒琴怀 31



2026(1)
总第 364 期

巴渝遗韵

- 1945：发现大足石刻 / 石 尘、杨中秀.....34
- 石窟艺术别开生面之作 / 李小强 / 文 罗国家 / 图.....39
- 龚晴皋妙语释图疑 / 吴 文.....44
- 一捧青绿终难忘 / 程 华.....48
- 黄桷树下是我家 / 葡 萄 / 文 游 江 / 图.....50

开卷有益

- 用文字丈量山河故土 / 吴佳骏..... 51
- 推介：《宇宙的另一边真相》
-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价值》 / 龙 滔.....54

文苑精粹

- 回望黄家垭口的烟火人生 / 刘凡君.....55

- 老镇远上白云间 / 李 晓.....57
- 遇见一座古桥 / 简云斌.....59
- 读书人 / 陈双吉..... 61
- 遇见重庆夜色 / 袁保亮.....63
- 三苏祠 / 何军林.....64
- 过大源祥博物馆 / 祝绘涛.....64

封面题图：宝顶烟云 / 国画 / 张 涌

封二：巴山渝水入梦来 / 国画 / 彭 石

封三：重庆民盟画院丙午迎春美术书法作品选

封底：石坚其志、丹鉴其心 / 剪纸 / 粟未希

今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 85 周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特别铭记。这个群体里，有传播思想的教授、宣扬主义的学生、仗义执言的律师、挥戈济世的将军、握枪奔袭的战士……为革命理想，他们有的扎根桑梓，有的背井离乡甚至漂洋过海，或牺牲在反动派的监狱里，或倒在枪林弹雨里，或被歹徒杀害。他们为国为民，勇往直前，用鲜血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用牺牲铸立了不朽的丰碑，给民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盟英烈。从本期开始，我们将用四期的篇幅介绍盟员烈士的事迹：

血沃西北：民盟西北总支部英烈概述

□ 钱昀 整理

西北总支部于 1945 年 2 月在西安秘密成立，自成立之初，便确立了“亲苏、友共、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陕、甘、宁三地的盟员烈士，用生命书写了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壮丽篇章。

盟员烈士牺牲的时间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1946 年到 1947 年，政治高压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对民主力量进行疯狂镇压。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西北总支部作为“反蒋堡垒”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一时期牺牲的烈士多因公开政治立场、领导民主运动而遇害。陕西牺牲的盟员级别最高、影响最大，主要集中在西安。

其中有以笔为矛，利用舆论阵地为民主呐喊的烈士王任和李敷仁。



王任（1901-1946），原名王锡立，后改名王任，字同公，河南桐柏县平氏镇人。1945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 年 4 月 23 日牺牲于西安玉祥门外。也是首位盟员烈士。

王任 1929 年秋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后痛感旧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不平，愤然取“天降大任于斯人”和“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之意，给自己取名为王任，字同公。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3 年秋大学毕业后，王任回桐柏等地教书，经常帮助穷人打官司。1934 年到西安，先后担任陕西省第一农业职业学校国文、英语、法律等课教员，

并兼办律师事务，不久即辞教挂牌做专职律师。他性情耿直，不屑权贵，加之精通法律，学识渊博，所受讼事常常胜诉，声望日高，时称“王任大律师”。

抗战胜利前后，王任在西安结识了杜斌丞。在杜斌丞的影响下，他认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动本质，坚定地把挽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方面。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10月发起组织法制学会。1946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召开时，王任联合20多名律师致电祝贺，并利用蒋介石提出的“行宪”口号，发起组织了“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并担任主要负责人，组织和团结法律界人士，利用合法方式为实现和平与民主而斗争。

1946年2月，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在各地掀起新的反民主、反共逆流。在西安，民盟西北总支部机关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积极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疾呼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西北总支部的活动令国民党当局极为仇恨，他们殴打报童，检扣报纸，对报社进行恐吓。面对暴行，王任挺身而出，在《秦风报》上发表谴责特务威胁人身安全、残害人民自由的文章。3月1日，大批特务冲入《秦风报》营业部，捣毁办公用品，砸碎报社招牌。王任慨然出任《秦风报》法律顾问，向法庭提出公诉，义正词严地控告反动派摧残舆论、打击民主、侵犯人权的罪行，同时在《秦风报》头版发表致报社长篇慰问信，痛斥特务暴行，社会各界反响极为强烈。

王任的言行令当局切齿痛恨。1946年4月9日，国民党特务以检查毒品为名，非法查抄王任的家，带去大烟土栽赃陷害，诬其吸食和贩卖毒品，将其逮捕入狱，并查封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王任在狱中坚贞不屈，据理力争。社会各界要求释放他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当局

决定对王任速予处决。4月23日，王任被西安市警备司令部以“烟犯”罪名，于西安玉祥门外枪杀。

王任牺牲后，国民党当局又枪杀李敷仁（幸未死，遇救），彻底捣毁《秦风报》报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西安血案”。中共中央和民盟中央十分重视。194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重庆代表团发动对西安特务暴行的抗议运动；5月29日，民盟公开发表抗议文告，要求惩办祸首，沈钧儒联合十几位律师界名流致函重庆律师会，要求调查王任被害真相。

7月26日，延安各界举行反内战、反特务暨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王任等烈士大会。朱德在讲话中高度赞扬诸烈士说：“你们在各地不怕反动派的压制和捕杀，坚决勇敢地为了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你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王任等民盟盟员用自己的鲜血，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暴政的怒潮。



李敷仁（1899-1958），

陕西咸阳市北杜镇人。学名文会，字敷仁，笔名老百姓、咸贞、劳百星、护人、富初、村长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1956年先后当选民盟

第一、二届中央委员。1946年5月被特务绑架枪杀未死，被当地群众所救，于7月到达延安，先后任延安大学校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但因枪伤严重导致身体长期衰弱，于1958年2月19日在西安病逝。1958年4月2日，毛泽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1931年，李敷仁由杨虎城将军资助赴日留

学，“九一八”事变后愤然回国，先后在多所学校任职。1937年，他创办《老百姓报》，以通俗语言反映民众生活，报道革命消息，唤起团结抗日的意识，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总发行量超百万份。但因抨击国民党当局，报纸被迫停刊。随后，他续办《农村导报》，亦遭查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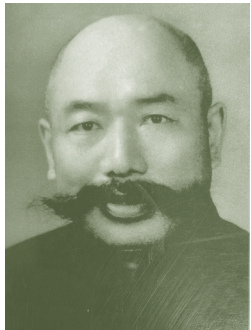
1942年起，李敷仁与杜斌丞、杨明轩等人一起创建民盟西北总支部，后任总支部执行委员兼青年委员会主任。1944年，李敷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民盟西北总支部支持下，1945年5月，李敷仁创办《民众导报》，任主编兼主笔，提倡民主，反对独裁，宣传革命。国民党当局对他和《民众导报》深恶痛绝，便衣特务对李敷仁跟踪盯梢，监视他的行动，竭力进行威胁、打击。

1946年4月底，李敷仁决定辞去《民众导报》职务，却遭特务绑架。5月1日，李敷仁在返回途中被特务绑入汽车，驶至偏僻处遭枪击。特务误以为他已身亡，慌忙逃离。实际上，李敷仁因习惯性低头猫腰而幸免于难，子弹仅擦伤头皮和射入肩胛。他被群众发现并救起，先后被转移多处藏匿。

中共陕西省工委获悉后，立即开展营救。7月17日，李敷仁抵达延安，卡在他颈部的子弹终于被取出。23日，延安各界举办欢迎李敷仁脱险抵延集会。26日，在延安各界反内战、反特务暨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王任等烈士的大会上，李敷仁拿着手术时取出的那颗子弹头发表演说：“国民党特务给了我一颗枪弹，并没有打死我。他们自己等于吞了一颗慢性炸弹，将来有一天是要炸毁他们自己的！”8月，毛泽东接见李敷仁，对他坚持民主、不惜牺牲的精神给予肯定，李敷仁感动地说：“今后民盟将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敷仁积极投身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陕西省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西安市政协副主席等。1958年2月19日，李敷仁因病逝世，终年58岁。



杜斌丞(1888-1947)，

原名杜丕功，字斌丞，陕西米脂县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民盟西北总支部创始人。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

改称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玉祥门外就义。

杜斌丞1913年夏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17年毕业后，在陕西榆林从事了十多年的教育工作。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优秀人才，开创了陕北教育新风。他思想进步，与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交往密切，逐渐倾向革命。1927年后，他到多地考察政情，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崛起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30年冬，杜斌丞回西安任杨虎城高级参议等职，设法营救共产党人，资助陕甘游击队，其住所成为共产党人的避难所。“九一八”事变后，他提出西北大联合主张，辅助杨虎城平定甘肃。1933年，他建议杨虎城联共反蒋抗日，促成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共同反蒋”协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又联络杨虎城部与中央红军建立联系。西安事变中，他积极促进事变和平解决，并参与起草“八项主张”，为和平解决多方奔走。

1942年，杜斌丞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

与筹建并主持民盟西北总支部，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他促成《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联合出版，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机关报。杜斌丞时常教育盟员：“西北民盟唯一有利的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接近，可以得到友党有力的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上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同年10月，他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他回陕主持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阴谋，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实施民主宪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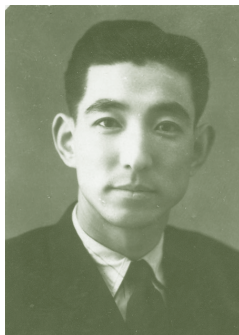
西北民主运动的发展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46年四五月间，盟员王任被枪杀、李敷仁遭暗杀，《秦风报》报社被捣毁，是为“西安血案”。杜斌丞拒绝了朋友们的劝说，“我在危难时绝不求一身之安全，置诸同志于不顾”，留在西安坚持斗争，发表《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的社论，公开揭露国民党全面反对民主的阴谋。

1947年3月20日，国民党攻占延安的第二天，胡宗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王菊人等人逮捕。杜斌丞在狱中受尽折磨，视死如归。他说：“叫胡宗南把我枪毙了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在最后的遗书中，他说：“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死生，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10月6日，国民党南京政府电令胡宗南对杜斌丞“即行处理，以免后患”，7日凌晨，杜斌丞被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1948年10月，毛泽东为杜斌丞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杜斌丞是西北民盟牺牲级别最高的领导人，他的遇害，给了全体民盟盟员极大震撼与打击。

还有杜良明、薛碧如等解放战争期间同期牺

牲的多位盟员，因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

1949年的黎明前夜，随着解放军挥师西进，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溃退前夕，对狱中政治犯进行了疯狂屠杀。许多坚持到最后的盟员，倒在了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前。或是在秘密军事策反中深入虎穴，在国民党军队中策划起义、为解放区输送情报与物资，因身份暴露被捕。或是因组织连带破坏：因民盟组织体系被破坏，骨干成员遭到通缉与定点清除。在这一时期，先后有二十几位盟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



孙寿名（1916-1949），名义德，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原属甘肃省）人，以字行于世。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8月21日在甘肃兰州就义。

1931年，年仅15岁的孙寿名参加了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部新一军十旅。抗日战争爆发后，孙寿名请缨，任营长，与日寇鏖战于山西中条山。因作战英勇，升任副团长。1940年，由前线调回西安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期间，他结识了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李敷仁等，对其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3年3月，孙寿名与唐曼陀一起联结了陕、甘、青、宁四省的进步青年数十人，以“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为宗旨，在甘肃平凉成立了“西北青年抗日民主促进会”（简称“西青会”），并担任主要领导。

1944年，孙寿名赴庄浪县联络密友马效德，准备发动反蒋武装起义。事泄，马效德被捕杀，孙寿名为此受到平凉专员郭培师的警告。孙寿名义愤填膺，满腔孤愤，提笔赋《鹧鸪天》词，

在悲愤难消之际，恰逢筹备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杜斌丞来到固原，促谈之时，孙寿名方知民盟主张“亲苏、友共，实现新民主主义”，大为受益。

1945年春，孙寿名被任命为胡宗南部38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平凉）上校副官处长。此时他结识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掩护他们的地下工作，成立了“利华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春，孙寿名被任命为胡宗南部38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平凉）上校副官处长。此时他结识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掩护他们的地下工作，成立了“利华股份有限公司”。

1949年初，与孙寿名有联系的盟员杜汉三、程海寰、严子夏等策划陕西长城部两个旅起义，事泄失败被捕。孙寿名被捕后，敌人先是诱降，后施用酷刑，将其四肢通电，指缝插针，企图使其供认与民盟的关系、民盟与中共地下党的秘密。他备受折磨，坚不吐实，使敌特终无所获。后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郭寄嶠派人持“孙寿名如承认民盟关系，即可引来见我”的亲笔手谕劝降，孙寿名亦不为所动。

5月中旬，他在监房中寻获小匕首，决定发动越狱，6月1日夜，越狱计划开始实施。不料后窗户上的第一层橡木刚切断，即被敌特发觉，越狱失败。为保护难友，孙寿名慨然承认自己是主谋，其他人是过节思家。此后虽又历经酷刑摧残，他仍坚贞不屈，始终坚守民盟和中共地下党的秘密。8月21日夜，孙寿名被匪特架至监外，先被刺刀乱戳，继而射杀，英勇就义。

孙寿名殉难后第4天，兰州城即被解放军攻克。随后，兰州市军管会的同志和孙寿名的战友，踏遍大沙坪，终于从其生前所镶假牙及衣着上辨认出遗体，备棺成殓，暂埋葬于华林坪。1950年12月10日，民盟甘肃省支部在兰州为孙寿名等烈士举行公祭。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

的挽辞是：“在甘肃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民盟盟员和共产党员的血流在一起。”

祁鼎丞（1893-1949），名兆甲，生于1893年，固原县黑城乡（时属甘肃管辖）人。1945



年8月经孙寿名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介绍进步青年赴延安参加革命。为进行合法斗争，祁鼎丞于1947年竞选为甘肃省参议会参议员，配合省参议员、民盟甘肃省支部宣传部部长许青琪同志进行了

反对“战乱特捐”的斗争。

1949年6月，兰州风雨飘摇。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革命志士进行迫害。6月17日，兰州解放前夕，长期盘踞甘肃的马步芳匪徒和国民党反动派自知末日来临，妄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大肆搜捕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进而以“共产党嫌疑”罪名将祁鼎丞等逮捕，关押在兰州新关秘密监狱。解放军大军逼近兰州，国民党残余势力向河西狼狈逃窜之时，又将祁鼎丞等30余名革命志士秘密转移至张掖。9月17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张掖驰进，敌特闻讯后惊惶失措，唯恐“事出意外”，在张掖县政府自卫队的协助下，将祁鼎丞等17名革命志士押至附近一处坟场内秘密杀害，草草掩埋。

1949年9月19日，张掖解放后，县人民政府组织专人挖出祁鼎丞等志士遗骨，购棺木17副安葬于贺家庄旁。1950年12月10日，民盟甘肃省支部在兰州为孙寿名、祁鼎丞等烈士举行公祭。



程海寰(1908-1949)，原名程步瀛，字以行，1908年10月出生在甘肃文县城关镇的一个书香之家。1926年毕业于兰州第一师范学校。1936年，为响应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日号召，在平凉策动反

蒋起义；抗战期间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国；1940年，在西安与杜斌丞等人营救了被捕的共产党员；1943年初，甘南农民起义爆发后，程海寰因势利导，促成了武都实力人物王德一及驻武骑兵营长张英杰率部起义；1948年9月为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联络民盟盟员汪剑平、共产党员杜汉三、聂青田等在水成成立了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西策会)，以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公推汪剑平为主席，程海寰为书记。1949年3月，西策会在水成新一旅驻地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新一旅、新二旅等部队在兴平、武功一带起义；拟定起义部队暂改编为川甘陕游击纵队，严子夏任纵队司令员，程海寰任政治部主任，杜汉三任参谋主任；游击纵队开往文、武、成、康等县，切断胡宗南部退路，配合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在西北的武装力量。起义即将爆发之际，水成会议讨论记录不慎落入敌特之手，起义全盘计划及西策会名单被全部暴露。程海寰因此被捕，后受尽酷刑，坚强不屈。1949年5月17日，程海寰等13人被敌特机关以“受命共匪，直承不讳”等罪名杀害于西安玉祥门外。



王仲甲(1907-1949)，甘肃省临洮县衙下集人。王仲甲曾任甘南农民起义军总司令，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9年6月30日在岷县被捕，1949年9月5日在武威西门外就义。

陈超群(1917-1949)，名希俊，定西县内官营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赤水县宣传部副部长。后受党的派遣担任与任谦同志的联络工作，为任谦的秘书，经任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后与王子元同志共同负责通渭、华家岭、定西一带的地下党的工作。1948年3月，他赴通渭进行地下工作，因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在监狱里，他虽经各种刑罚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始终没有讲一句不利于党的话。兰州解放前夕，陈超群同志被敌特活埋于兰州沙沟秘密监狱。



王子元(?-1949)，通渭县人。曾参与发动及领导1943年的甘南农民起义，甘南农民起义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经王新潮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以后与陈超群同志共同领导通渭、华家岭、定西一带的地下党和民盟的工作。1948年3月，王子元同志与陈超群同志同时在通渭被捕，同时被押送至兰州。王子元同志在监狱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定，在敌特的严刑摧残面前仍顽强地保守了党的秘密。兰州解放前夕，亦被敌特活埋于沙沟秘密监狱。



李文轩(1908-1949)，泾川县党原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经程海寰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入党以后，李文轩同志曾任陇东武工队宣传干事等职，后以开客栈为名建立联络站，负责为陕甘宁边区输送人员、武器和情报。1949年2月，因联络站暴露，旋遭逮捕，被押送至兰州大沙坪监狱。

1949年9月17日夜，李文轩同志被马步芳匪徒勒死于张掖县西南之贺家庄。



杜汉三 (1887-1949)，甘肃省天水市人。于1949年3月9日在西安被捕，同年5月20日被敌特杀害于西安太阳庙门外之秘密监狱中。

聂青田 (1915-1949)，甘肃省天水市人。于1949年3月9日在西安被捕，同年5月17日在西安玉祥门外就义。



王教五 (1906-1948)，甘肃陇西县人，于1948年10月13日在兰州逝世，1950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程万里 (1916-1949)，山东省曹县人。1946年经杨继宝、石鉴章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其当时任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附中军训教官，即在中共皋榆工委下属的学委领导下从事民主宣传及学生运动工作，并任学委委员。1949年7月21日因学委被敌特破获而被捕，1949年8月24日被残杀于兰州涉沟秘密监狱。



朱亮 (1915-1949)，甘肃省和政县人。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曾历任国民党甘肃省保安第二团营长、大队长等职。一贯倾向进步，思想革命，遂于1946年秋经任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复于

1948年经中共陇右工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兵运工作，并拟于解放军逼近兰州时率所部一营兵力起义。1949年7月因其联系人叛变，乃遭密捕。朱亮在狱中表现得至为坚强，

在其被敌特挖去双眼、剁去一手一足后仍在墙上刻下了“英雄自古谁无死？死是人生的归宿。何必怕呢？”之绝命书。1949年8月21日，朱亮口中被敌特塞进棉花、脖子上紧套麻绳，活埋于兰州沙沟秘密监狱。

唐曼陀 (1904-1947)，号铁僧，甘肃省岷县人。曾任孙寿名部营长，1945年经孙寿名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在岷县与孙寿名、李俊楠等共谋发动反蒋起义，事泄，逃往陕西。1945年奉杜斌丞先生之命与孙寿名、高月波等返回甘肃从事民主宣传及兵运工作，因被人告发，于1947年在岷县被捕，旋即病逝于狱中。

石鉴章 (1917-1949)，甘肃省永登县人。1944年在重庆经杨继宝、朱镜堂介绍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后任国民党甘肃省府人事室科员，从事民主宣传及搜集情报等工作。于1948年秋被捕，1949年8月8日被杀害于兰州沙沟秘密监狱。

李俊楠 (1914-1947)，甘肃省岷县人。曾任孙寿名部之九连连长，1941年曾与孙寿名、唐曼陀等共谋发动反蒋武装起义，事泄，被捕押。出狱后，于1945年经孙寿名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仍在岷县山区进行民主宣传及策反地方武装等活动，于1946年冬遭敌特秘密逮捕，1947年被公开枪杀于岷县。

尚银海 (1917-1949)，甘肃省平凉人。1945年经孙寿名、赵益斋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与任谦、孙寿名等在平凉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遭敌特逮捕，被押往兰州。兰州解放前夕复被解至武威，1949年9月17日夜被马步芳匪特勒死于张掖县西南之贺家庄。

白连成 (1912-1947)，陕西省韩城县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曾任定（西）通（渭）会（宁）三县联防自卫队大队长。1945年经杨继宝、朱镜堂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

6月，因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事泄暴露，遭敌特逮捕，同年8月被枪杀于天水。



程景瀛 (1925-1949)，甘肃省文县人，程海寰烈士之胞弟。1946年经程海寰、金作鼎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在甘肃省兰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甘肃学院等院校与杨怀仁（甘肃学院教师）、王学义（甘肃学院学生）等共同从事学运工作。1949年6月，因学运组织中被特务学生混入，程景瀛身份暴露。后经地下党员乔涛介绍潜赴延安，行至华家岭时被尾追而来的特务逮捕。同年9月17日被敌特勒死于张掖县西南之贺家庄。

吴渊彦 (1919-1949)，安徽省合肥市人。1946年经任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共党员乔涛（时任国民党兰州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领导下从事兵运工作。在1949年7月的大搜捕中与乔涛等同时被捕，同年9月17日与程景瀛、尚银海、李文轩等同被敌特勒死于张掖县西南之贺家庄。



阎栋材 (1922-1949)，山西省猗氏县人。1947年12月经杨继宝、石鉴章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阎栋材曾担任《西北经济时报》《甘肃民国日报》记者、编辑，在报刊上发表抨击时弊、揭露暴政的文章。于1949年7月23日被捕，同年8月8日与石鉴章等一同被残杀于沙沟秘密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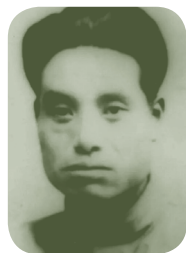
尹克强 (1919-1949)，甘肃省天水市人。曾任天水市东关小学校长，1945年经聂青田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

年1月随程海寰等赴陕西在新一旅中进行策反及起义准备工作，3月9日在西安被捕，5月20日被杀害于西安太阳庙门外秘密监狱。



金作鼎 (1903-1948)，名铸九，贵州省安顺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天水团管区上校司令，1942年被解职。1946年经程海寰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参加了程海寰等人组织的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任策动委员会委员，积极从事了策动新一旅及新二旅起义的工作。3月9日在西安被捕，5月17日被杀害于西安玉祥门外。

杨国英 (?-1949)，名丽渠，系金作鼎烈士的夫人。湖南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杨国英曾在湖南参加过党领导的农民赤卫队，并参加过攻打长沙的战斗。1946年经程海寰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亦积极参加了策动新一旅、新二旅起义及组建川陕甘游击纵队等工作，并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科长。1949年3月9日与金作鼎一同被捕，同年5月17日被杀害于西安玉祥门外。



严子夏 (1898-1949)，陕西汉南人。1944年经杜斌丞介绍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并奉杜斌丞先生之命在国民党地方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48年起任国民党新编第一旅（长城部）副旅长兼第一团团团长，积极参与了程海寰、汪剑萍等发起的组建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的工作，任策动委员会委员。此后又为策动新一旅及新二旅的起义和筹建川陕甘游击纵队不遗余力，并被推举为川陕甘游击纵队司令员。在起义爆发前夕被特务诱捕，旋于1949年5月17日就义于西安玉祥门外。

王友仁（1913-1949），甘肃泾川人。1945年在陕西经孙寿名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一直在陕西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48年起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所属之新编第二旅副旅长兼一团团长，与严子夏烈士同时参与组建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的工作，任策动委员会委员。此后亦积极参加了策动新一旅、新二旅起义及组建川陕甘游击纵队的活动，并被任命为川陕甘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因机密泄露，于1949年3月9日被敌特诱捕，与程海寰、严子夏等同时就义于西安玉祥门外。

张子明（?-1949），陕西省人。于1943年加入孙寿名领导的“西北青年抗日民主促进会”，1945年集体转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一直在杜斌丞领导下从事兵运工作，并曾为陕甘宁边区购买、输送枪支弹药、布匹、西药及望远镜等。后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所属之新一旅副团长，1949年3月10日因参加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及策反新一旅、新二旅活动被捕，同年5月17日被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

先烈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功昭日月，将永远为后人所崇敬、所怀念。

薪火相传：陕甘宁传统教育基地地图

而今，散布于西北大地的传统教育基地，正是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注脚。历史并未尘封，英烈的精神在今日的教育基地中得以永生。这些场所不仅是凭吊之地，更是多党合作历史的生动课堂。

陕西·米脂县斌丞图书馆

米脂县斌丞图书馆是1948年为纪念杜斌丞先生，经周恩来提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而建立的。1948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陕北接见杜斌丞故乡——米脂县县长姬伯勋时专门谈到了建立杜斌丞图书馆的问题，称赞杜斌丞为“坚贞的革命战士”“鲁迅式的共产党员”。同年



10月，米脂县建成斌丞图书馆，作为永久纪念。林伯渠亲笔题写了“斌丞图书馆”馆名。毛泽东称杜斌丞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并亲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斌丞图书馆于1984年重建新馆，内设杜斌丞纪念室，纪念室主要介绍了先生生平业绩和重要社会活动，陈列着先生部分遗存及社会各界写给烈士的挽联、挽词等。1997年10月，民盟陕西省委召开纪念杜斌丞烈士殉难50周年大会，在米脂斌丞图书馆举行了杜斌丞烈士铜像揭幕仪式。图书馆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11月，斌丞图书馆被民盟陕西省委列入“民盟（陕西）传统教育基地”。

西安南郊烈士陵园：杜斌丞、王任、杜良明等盟员烈士的遗骨安葬于此。

宁夏·固原长城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孙寿名、祁鼎丞、孙义智三位宁夏籍盟员烈士的事迹陈列于基地内的“固原英烈馆”展馆“争取和平与民主”专题展区内。孙寿名烈士铜面塑像穆立在此，墙



面上展示了孙寿名烈士的简介及其“革命活动速写”文字手迹、作品、事迹等图片，还有盟员烈士祁鼎丞、孙义智和宁夏民盟先辈韩溥事迹简介，展柜中陈列着孙寿名烈士早期辗转于西北革命活动中曾用过的皮箱等遗物。2025年获批为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

甘肃·兰州烈士陵园：

兰州市烈士陵园，坐落在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是为纪念1949年8月兰州战役中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始建于1952年，1959年国庆正式建成开放。1963年被列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中宣部列为全国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王教五、孙寿名烈士墓，以及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孙寿名烈士后迁葬于此，园内碑刻详细记载了甘肃民盟在解放前夕的艰苦奋斗。



程海寰烈士纪念馆：

坐落在陇南文县白水江南岸风景秀美的江南公园内。纪念馆共设有两个展厅，主题为：追逐光明的脚步——程海寰烈士生平展。以时间为序分为“位卑未敢忘国忧”“心若磐石志如竹”“甘洒热血卫吾华”三个单元，集中展现了程海寰烈士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寻救民救国道路，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不息，直至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历程。

结语

从杜斌丞在西安玉祥门的从容就义，到孙寿名在兰州大沙坪的喋血黎明，民盟西北总支部的英烈们用生命诠释了“民主、团结、牺牲”的真谛。今天，当我们走进米脂的斌丞图书馆或固原的长城梁，不仅是在回顾历史，更是在接受一场精神的洗礼——它提醒我们，今日的民主政治，正是建立在无数先辈的鲜血与信仰之上。☞

（本篇素材由民盟陕西省委会、甘肃省委会提供）



栏目主持：陈世广



李公朴：把教育做成民主的行动

□ 姜媛

人物档案：

姓名：李公朴，原名永祥，字晋祥，号朴如，少时自名公朴

生卒：1902.11.26—1946.7.11

籍贯：江苏常州

核心思想：教育要与做人、做事和求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

教育主张：“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组织教育”“人格教育”缺一不可

1902年11月26日，江苏省武进县的一个贫苦家庭诞生了一个男孩。许多年后，这个男孩被奉为中国“民主之神”。他就是民盟早期领导人、社会教育家李公朴。李公朴少年时曾在镇江京广洋货店做学徒，因与一些青年组织

爱国团抵制贩卖日货，被店主解雇。后就读于镇江润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因反对校医虐待学生酿成学潮被开除。1924年入沪江大学附属高中学习，1925年考入沪江大学半工半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投军北伐。1928年赴美留学，对美国及世界各国的教育状况进行考察研究，认为学校“是改善社会环境的策源地”。在抗战前办国难教育，抗战时办抗战教育。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同年1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他是七人之一。抗战胜利后，李公朴致力于社会教育，投身于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6年7月11日晚，他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年仅44岁。

一、教育民主行动的思想起源：“三自”

精神与“活读书”

1928年，李公朴离开部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阿雷干州黎德大学专攻政治学，其中包括法文、社会史、社会学、市政研究，他还利用余暇之际兼顾教育研究。李公朴留学美国期间，边读书边打工，并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写了数十篇“海外通讯”，向国内介绍美国社会情况，包括政治、经济、生活和风习。其中，在《受打击后的振作》一文中，他援引奥地利著名教育家邓格勒博士的演讲《奥国教育的新精神》指出，“奥国以前的教育是一种机械的例行公事的顽固教育，学校内没有自由活泼的空气，教员面似‘铁’，课堂内的空气‘冷’得吓人。”而一战重建后，奥国新教育注重使得每个儿童可以得到下面的“三自”精神，即：一是自由；二是自治的精神，自己管自己；三是自动的表现，予以自由发展本能的机会。采用所谓的“社会化课堂制”，把许多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比如每小组十个人，每个人须共同照料大家读书游戏等事务，每人均有机会做领袖，有机会管理和执行规则，每人均要时刻照顾并保护本组的信用和名誉，都须有适当的服从领袖的态度。

1930年11月，李公朴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上海。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李公朴开始重新探索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当时他的身份是新闻记者。1932年12月1日，他在《申报》创刊60周年纪念的时候，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1933年2月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6月添办《申报》业余妇女补习学校。8月又增设业余补习学校的分校，补习的学生大部分都成为职业界救国会的骨干。以后他又主编《读书生活》半月刊，常常刊登

传播马列主义普及社会科学的重要常识。

李公朴在开办补习学校的过程中常常和学生谈话，而“活读书”和“读活书”就成为他们谈话的中心意见，也是李公朴在自身教与学中的一点经验。他有两方面的主张：一是读书需要“活读书”，将自己的经验与书本融合起来，形成新见地；二是读书需要“读活书”，单读他人已有的经验所写成的书是安静的书，需要实际生活的经验，要注意社会上一切活动的事务，这些活的东西就是活的书，是活的知识。“活读书”和“读活书”，然后整个社会民族才可以慢慢苏转地“活”过来。

二、教育民主行动的实践“抗战教育”与“行动教育”

1935年日本入侵华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李公朴被推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救国会的领袖人物之一。1936年11月，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李公朴等“七君子”。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7月31日，“七君子”胜利出狱。不到半个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当时，华北是抗战的中心。李公朴为亲身了解前方的实情，以更好地唤起和动员民众投身抗战，踏上烽火连天的华北战场。在山西，经周恩来同志决定，李公朴担任“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创办了由他担任社长的“全民通讯社”，为抗战宣传教育及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四处奔波。1937年11月，与沈钧儒等积极筹建全国抗敌救亡总会。12月，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并成立了全民通讯社总社。1938年1月，《民众动员论》在武汉出版。同月，应山西阎锡山之邀，到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被委任

为副校长，聘请一些进步学者、教授到民大任教。

李公朴拟订的民族革命大学十大纲领符合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支持李公朴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李公朴一行深入华北敌后晋察冀，教学团好似流动的学校，每到一地都开办短训班，宣传抗日，传播抗战教育的种子。李公朴在《致民大同学的公开信》中说，创立民族革命大学是为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革新行政，改造军队，保障民族革命战争之最后胜利。”民大教育的方法是“一反过去理论与实践之分离”，实施“教学做用”合一的“行动教育”。“过去坐在教室里读死书死读书的教授法，不能使青年学生得到实际工作的指示，以致多数学生在毕业后找不到适当的工作。”民大本着“即学即教，即教即学，即用即做，即做即用”的方针，理论固然是实践的指针，然而理论如不透过实践，就成为空话，所以最好的教育，是实践的“行动教育”。

李公朴6个多月的晋察冀之行，认为晋察冀是当时民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也是将来新中国的雏型。从1937年8月到1940年11月三年多时间，他四上华北抗战前线、二访延安，完成了四五十万字抗战言论、战地通讯、抗战教育文章，并大力推行抗战教育。李公朴强调，抗战教育要坚持为抗战服务的原则，但抗战教育绝不是把学校教育取消了，平时教育不要了；抗战教育也不是只顾及目前的需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必须彻底改革过去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管理，树立起一个适应现代需要的新的教育体系。他提出了“中国化”“地方化”“主义化”“实用化”“大众化”“革命化”“战斗化”的战时教育宗旨

和方针，同时他认定抗战教育是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

在李公朴看来，一切教育都要适合我们的国情，“我们不反对吸收各国的新文化，但必须吸收其优点，更不要只会建洋房而不会建筑中国式的瓦房。”“一切教育必须以‘用’为目的，必须与实际的生活和抗战建国的工作打成一片，绝对避免过去那种理论与实践完全分离，生活与教育完全脱节的死教育。”1938年5月《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出版，李公朴在文中强调，各级教育都应把“教育做用”一致化，在这个原则下，职业教育的生产教育与技术教育，应该普遍的实施，某种教育与某种行政也应合二为一。教育要废除以往的“贵族化”“特殊阶级化”，不分贫富，不分阶层，不分男女，都同样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都必须接受教育；教育要脱离利己的范围，要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而奋斗。

三、教育民主行动的创新：社会大学的制度探索

1946年1月15日晚，陶行知和李公朴筹办的社会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在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社会大学的创立，实际上是一场教育革命，对旧的教育制度、教育传统的挑战。社会大学是中国历史上向来没有的学校，社会大学实施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虽然受到重重阻力并最终夭折，但其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人才奠定了基础。

社会大学是夜大，第一批招收的学员有中小学教师、公务员、工商业者、文化工作者、失业青年等。社会大学的第一期学员约200人，按照每人的特长和兴趣分配到各系学习。社会

大学的教育内容是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组织教育及人格教育四者并重，这也是开中国教育之先河。教育方法上提倡真正的自觉纪律，要使每个同学能做到自动、自学、自问的境界。社会大学也有训育，其方针是发扬民主精神，训育方式不是人训，而是自训、自治、自审，自我批评和互相检讨。

社会大学商定废除一般学校的考试制度，建立新的五项学习进度考察办法，即学生对本学期每一课程的“教学做”精华写出心得报告；解答问题，学生可翻书、可问人，给予足够时间思考；每个学习小组做总的学习报告；集体专题研究；学习上及生活上的自我检讨。上述考查办法在当时是一般学校所没有的。

四、教育民主行动的宗旨：把教育权还给老百姓

“根据民族主义所谓的发扬民族精神，首先须从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做起，在各民族自治的原则下，给他们以教育自由，增强民主的科学教育。根据民生主义，要注意到国民生活的实际情形，若不能使国民走上丰衣足食的大路，就没有办法谈到普及教育。”1946年，李公朴在《新宪法上的教育问题》中提出，新宪法中的新教育，应该规定各校一律免费，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学龄儿童，免纳学费的同时须供给一切必要的生活需要；成人补习教育，尤应使个人及眷属生活上不因受教而发生任何困难；还要注意到辅助失学职业青年。

李公朴表示，在新宪法上至少要保障人民有教育权，有办教育权，有把教育办成为人民自己除痛苦造幸福的教育权！绝不允许学校再是官僚养成所，而来贻害人民。“政府人员既

然是推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就应该自己有自己的教育权，把教育权还给老百姓。”提倡除了有关教育制度等事项，由中央管理外，其余均应由地方自理，不能再给少数人利用文字曲解来统治人民的思想。“如果真心想造福人民，造福国家，那末首先就应当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制定宪法，建立民主教育的体系，实行民主的普及教育。”

尾声：“天快亮了”——为民主、为教育的民主行动牺牲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较场口血案”，李公朴等各界人士60余人被打伤。面对险恶环境，李公朴说：“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为了民主，我已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了。”1946年5月，李公朴从重庆来到昆明，不顾个人安危，与民盟及各界人士积极发动《呼吁和平宣言》的万人签名运动，不遗余力地揭露反动派出卖祖国，发动内战的种种罪行。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同夫人在回家途中遭遇便衣特务暗杀，子弹从李公朴后腰射入，经腹腔至右腹穿出。李公朴因流血过多而昏迷，略微清醒时他用微弱的力量问妻子“外面什么时候了？”妻子告诉他：“五点了。”李公朴说：“天快亮了！”说完，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本文改编自姜媛“李公朴：‘民主之神’的教育情怀”，原载《知行合一——民盟先贤教育行思录》，陈世广执笔）

潘序伦在重庆办学的岁月

□ 程道江



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及内地工商企业纷纷西迁，汇聚西南大后方，在四川相继成立迁川工厂联合会、纱厂联谊会等实业组织，同心协力发展生产、支援抗战。面对大后方企业迫切需要改善经营管理、规范财税缴纳、办理工商登记、培养专业会计人才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会计教育先驱潘序伦毅然将立信会计教育事业迁至重庆，在巴山渝水间开启了一段艰苦卓绝、影响深远的办学岁月。

内迁企业界人士常登门求教，与潘序伦共商企业发展与财经实务，皆获其倾心帮助与专业指导。潘序伦与实业家卢作孚结为至交，受邀担任民生公司会计顾问，亲手为企业建立现代会计制度，以专业之力支撑后方实业运转，为抗战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一、千里入川，于危难中重启立信基业

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还都”后，76号特务在“孤岛”上海实行绑架、暗杀，猖獗一时。是年6月，一名工商界的立信校友被76号绑架，花费了赎金被释放。他暗自庆幸自己终于可以活着走出魔窟经过一间房间时，恰巧里面有人开门走出了，窥见该房间挂在墙

上的黑板上有潘序伦的名字。爱国的潘序伦校长已经上敌人的黑名单，惊魂未定的他心急如焚，走出76号后赶紧将情况告诉潘序伦。

得知已被76号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后，潘序伦当机立断，迅速稳妥交接各项工作，随即只身撤离上海“孤岛”，搭乘太古洋行海轮前往香港。

在辗转赴渝之前，他将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与会计学校的日常事务，郑重托付给李文杰、钱迺澂、李鸿寿、陈文麟、叶朝钧五位同仁共同维系，其中李鸿寿主要主持学校校务。

在风雨如晦、环境极端险恶的局势下，李文杰、李鸿寿等人始终坚守阵地，并与远在重庆的潘序伦保持秘密联络，确保立信事业薪火不断。

1940年7月，潘序伦乘飞机经香港抵达重庆，由此开启了立信迁徙四川办学的征程。彼时重庆已有刘芷休创办的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初期办学顺利，却在1939年日机大轰炸中校舍被毁，先后疏散至合川、北碚，办学条件极为简陋。潘序伦抵达后，将刘芷休等在北碚所设的立信会计学校改组扩建为专科学校。与补习学校合并，在废墟之上重建立信教育阵地。

为稳固办学根基，潘序伦广邀社会贤达组建校董会，聘请实业家卢作孚担任副董事长，康心如、卢子英等名流为董事，既凝聚社会力量支持办学，也大幅提升立信在川渝地区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为了满足重庆市区职业青年业余深造的需求，潘序伦先生决定在市区增设专科班，为在业青年提供夜间授课的机会。鉴于招生工作进展顺利，潘序伦先生需要扩大办学场地，以满足教学需求。然而，面对资金短缺的困境，潘序伦依然秉持着创办教育的热忱，决心克服困难。这一时期，潘序伦早年培养的众多学生，包括那些曾经随他前往重庆的学生也纷纷表达了对母校发展的关切之情。经过集体商议，学生们提出了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难题的建议。潘序伦虽一贯不喜庆祝个人寿辰，但为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不得不破例同意以庆祝其五十岁生日为契机，发起募捐活动。这场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据购地建校的相关报告指出，在多方努力下，“大楼”经费的筹措工作历时八个月，总共募集到建筑费用国币 121.92 万元。1943 年建成小什字“立信大楼”，集教学、办公、出版于一体，让立信在重庆市区站稳脚跟。

从北碚临时校舍到市区立信大楼，从补习学校到专科层次，潘序伦以“教育救国、会计兴邦”的信念，在战火中搭建起覆盖补习、职业学校、专科的完整会计教育体系，成为大后方独一无二的会计人才摇篮。

二、严谨治学，以“学验并重”培育实用人才

潘序伦办学始终坚守“信”字初心，提出“管教务期严格，学生学验并重”的理念，把职业道德与实操能力放在首位，培养“不做假账、坚守准则”的会计人才。

教学上，他打破传统书本教育模式，构建“学校+事务所+出版社”三位一体体系。1941 年 6 月 1 日，潘序伦与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在重庆合资成立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地址位于林森路 16 号。同年 6 月 9 日，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该社成立（设字 494 号），额定资本 10 万元，潘序伦任社长，生活书店派徐伯昕任总经理，后由中共地下党员诸度凝担任经理，主持日常业务。潘序伦主编的 7 种核心会计教科书（商业簿记、初级会计学、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学）出版后供不应求，抗战期间，大后方十之八九的大专院校和自修会计的学生均使用该丛书，中等学校更是几乎全部采用，有效缓解了战时财经教材短缺的困境。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课程设置紧贴战时需求，增设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实务等内容，拒绝空泛理论，强调即学即用。

他聘请会计师事务所骨干、历届优秀毕业生任教。邀请黄炎培、马寅初、章乃器等名家讲学，定期举办学术讲座与实务研讨，营造浓厚学风。对学生严管厚爱，要求认真听讲、勤做练习，作弊者一律开除。组织簿记、珠算竞赛，强化技能训练。安排学生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厂矿企业参观实习，把课堂搬到账桌前、车间里，确保毕业即能上岗、上岗即能胜任。

在“毕业即失业”的年代，立信学子凭借扎实技能与诚信品格，成为工商、金融、机关单位争抢的人才。潘序伦曾自豪地说：“走进任何一家中等规模以上的工商企业，总会碰到一两位立信会计学校毕业的主管会计。”数万学子从这里走向大后方各条战线，撑起战时经济核算的脊梁。

三、坚守气节，于风雨中彰显爱国担当

潘序伦不仅是严谨的教育家，更是有风骨、

有担当的爱国知识分子。在重庆办学期间，他顶住压力、坚守正义，以实际行动支持进步事业，书写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时任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国民党腐败与四大家族敛财遭迫害，被明令禁止任教。马寅初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策，1940年12月遭到关押。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1942年8月马寅初获释后，软禁于歌乐山木鱼堡，国民党当局对马寅初专门发布“三禁”，即禁止演讲、禁止担任公职、禁止发表文章。1943年，潘序伦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令，聘请马寅初到北碚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并让他带儿子一起住在北碚校内，妥善安排马寅初的生活起居。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得知后，召见潘序伦于青木关教育部，当面给予训示警告。潘序伦一笑置之，辨说在私立高校任教并不是担任“公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纸来源基本断绝，造纸化工原料极其匮乏，大后方纸张等生活日用必需品陷入严重短缺的困境。重庆是大后方的文化中心，纸张短缺的矛盾尤为突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刁难《新华日报》，欲置死地而后快。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纸的配额，可给《新华日报》的份额严重不足，新华日报社派人自行采购，纸商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威胁。

潘梓年、潘汉年兄弟俩是潘序伦的远房族侄，他们同是江苏宜兴走出的名人，在重庆常有来往，潘梓年称潘序伦“四叔”。潘序伦作为著名会计师，在上海迁川企业及四川工商界中有广泛的人脉。立信董事会成员多为重庆举足轻重的人物。立信会计学校董事长陈其采，是国民政府委员、主计处长，是陈立夫、陈果夫的叔叔，其哥哥陈其美是辛亥革命先驱，对蒋介石有知遇之恩。国民党顽固派知道立信背

景硬，而且属于私人办学更需要筹集经费，因此不太敢对立信轻举妄动。

潘序伦冒险与中共地下党合办中兴造纸厂，亲自设计商标、申请注册，将生产的新闻纸盖上“立信”标识，巧妙通过军警检查，源源不断送往《新华日报》社，保障党报正常出版。周恩来高度评价：“中兴纸厂就好比我们的前线作战的一个兵工厂”。

他还在公开演讲中呼吁会计人员坚守良知、杜绝假账、严防侵吞公款，将会计职业道德与国家财经纪律紧密结合，倡导“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行业风气，让“立信”精神成为大后方会计界的道德标杆。

四、薪火相传，立信精神永驻山城

抗战胜利后，潘序伦返回上海开拓事业，将重庆立信会计学校无偿移交本地热心人士，推举卢作孚担任董事长，让立信教育在山城扎根延续。

回望在渝岁月，潘序伦以一人之力，带动一方教育、规范一个行业、支撑一片经济。他创办的学校，填补了大后方高等会计教育空白。他编写的教材，构建起中国现代会计学科体系。他倡导的“立信”精神，成为会计行业永恒的价值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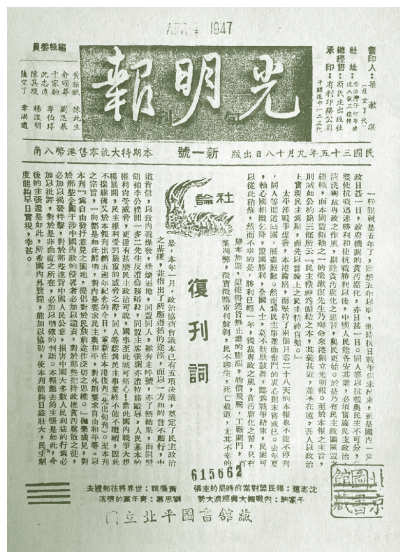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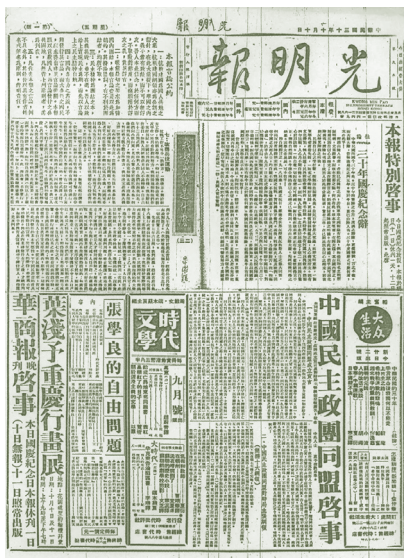
烽火岁月里，他是坚守操守的教育者。民族危难时，他是心怀家国的爱国者。潘序伦在重庆办学的经历，不仅是中国现代会计教育的重要篇章，更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以学报国、坚守信仰的生动缩影。那段在北碚陋室、立信大楼里苦读与耕耘的时光，早已融入重庆城市记忆，化作“诚信为本、学验并重”的精神财富，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作者系大足区盟员，本文根据民盟市委会2025年盟史课题成果汇编）



《光明报》（旬刊）复刊纪略

□ 迟云平



左为1941年梁漱溟在香港创办的《光明报》，右为1946年复刊的《光明报》复刊号

1946年9月18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国内政治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光明报》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以旬刊形式在香港复刊。这一天恰逢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日，发刊词中写道：“当此国内战争大规模展开，民主权力受到严重的威胁之际，同人等认为民主事业终不能不继续。”这份复刊声明，既是对时局的回应，也体现了民主人士在艰难时局中坚持发声的决心。

一、复刊初期的版面与宗旨

《光明报》旬刊明确宣示其宗旨为“对内要求民主与和平，对外要求自由和平等”。新

一号于1946年9月18日出版，刊名位于首页顶端居中，右侧列明督印人梁漱溟（由萨空了代）、社址、总经售与承印单位，左侧则列出编辑委员会名单，包括黄药眠、俞颂华、千家驹、沈志远、陈其瑗、萨空了、陈此生、刘思慕、李伯球、杨浚明、章洪道等民主人士与文化界代表。该期共24页，此后各期多为16页，仅新十一、十四、二十二期为20页。初期目录多印于内页“短评”栏目前后或封底。

二、版面革新

自新十一号起，刊物在形式上进行了显著调整：增设封皮，刊名改为竖排置于左侧，目



短评



社论

录移至封皮，并设计了具有鲜明象征意义的封面图案（一支高举的火炬发出光芒，照亮下方的报刊），寓意“以笔为矛，以刊为盾”，在黑暗的时代中传播光明、启迪民智。编辑出版方面，除注明督印人外，编辑者统称“光明报社”，体现了集体办报的色彩。

三、内容特色

作为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延续了其公布民盟文件、传达政见的功能，同时也为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提供言论平台。刊物每期至少刊载一篇社论和数篇短评，围绕时局发表主张、批判弊政，形式还包括声明、专论、通讯等。除社论、启事等代表报社立场的文章外，多数稿件均署名或标注笔名，保持了言论的公

开性与责任感。

四、出版困境

《光明报》旬刊的出版过程充满波折。自1947年2月8日新十五号后，出版即出现间断；十六、十七号延至3月18日才合并出版；新十八号更迟至5月14日问世，此后仍难以按期出刊。报社在刊物中坦诚困境，指出“发行上的困难、市场的封锁、资金的缺乏”是主要原因，并直接向读者呼吁：“请直接长期订阅来支持这华南的民主堡垒，我们热烈的期待着你们的援助！”折射出当时民主报刊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下的生存艰难。

五、最终停刊

尽管编撰团队团结坚守，试图克服种种限制，但随着国内政局持续恶化，特别是国共内战局势的紧张与对民主言论空间的挤压，《光明报》旬刊最终在1947年7月19日出版新二十二号后停刊。关于停刊原因，记者陆诒曾模糊记述“因故于1947年7月便停刊了”。此次复刊历时约十个月，共出版22期，成为战后民主运动一段重要的舆论见证。

（作者系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同舟小屋创始人）



《光明报》新十一号



《光明报》新十六、十七号（合刊）



推迟出刊的《光明报》新十八号



《光明报》新二十二号（之后停刊）



栏目主持：余 鲲

沧白堂的先们

□余 鲲

张冠生先生曾对我说，他每次走进民盟中央办公大楼的时候，都会看看挂着的民盟历届主席像，然后想想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对得起从前的先生们。他管这叫“头顶三尺有神明”。

但重庆市党派大楼的大厅里没有悬挂先生像，因为有五个党派在楼里办公，挂谁的像都不合适，倒是门口挂着的五个党派市委的牌子，常常引得到洪崖洞参观的游客驻足拍照。他们不知道，这里曾是一栋叫沧白堂的建筑，它因为“沧白堂事件”而在统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沧白堂原名叫“杨沧白纪念堂”，坐落在重庆沧白路中段，是抗战中期蒋介石为了缓和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控制四川，堵塞四川地方势力要求“川人治川”之口，以纪念国民党元老、四川重庆巴县（今巴南区木洞镇人）



沧白堂旧址现为民主党派大楼

杨沧白而修建的，厅堂较大，院落宽敞。

也许因为各种关于“沧白堂事件”的资料与研究确实已经够多了，我每次走进大楼，反而会想想这次事件里那些民盟的先生。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四次会议起，开始改为在沧白堂举行聚会，意义更为重大，因此参加群众更为踊跃，每次参加活动人数达千人以上。1月16日晚来作报告的民盟代表是秘书长张东荪先生。张东荪先生一开始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为此，他发动了“科玄之争”，经过这一系列公开的辩论，张先生毅然放弃了自己曾经的观点，不仅拥抱了唯物主义，还成为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他为此还留下了一句话：“被灌输的信仰，远不如通过自身学习获得的信仰坚固”。这也许正回应了苏格拉底那句话：“一万次的知识灌输，

不如一次内在的唤醒”。但由此认为张东荪先生是一个软弱的书生那就大错特错了。由于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妄图请张东荪先生出山，遭到张东荪断然拒绝。恼怒的日军把张东荪抓进监狱，孰料，张东荪不但不为所动，甚至在监狱里拿扫帚棒打日本兵，其铮铮铁骨可见一斑。

1月18日晚上的第六次大会，由民盟盟员李公朴教授主持。他对大家说：“前、昨两天会场秩序欠佳，国民政府天天在协商，我们在会场中亦应表现和谐与协商之空气才好。”李公朴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教育家，在抗战前办国难教育、抗战时办抗战教育、抗战后办民主教育。在重庆时期，他与同为盟员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共同创办社会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主持校务，把爱国与民主思想融入社会教育中，很快成为国统区内革命的新型学校和民主运动的营垒。为创建新中国培养了300多名人才，有15位社大学员牺牲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其中包括程谦谋和胡作霖两位盟员。

第七次民众大会是1月19日晚在沧白堂举行。会上，被张君勱称为“民盟之父”的梁漱溟先生报告了整军方案和民盟提出的主张：军队应该不属私人，不属党派，不属地方。梁漱溟在讲话的时候，特务打手们多次扔石头、放爆竹。但耿介的梁漱溟并没有因此停止代表民盟发出声音。在他的晚年回忆中写道：“（1946年）2月4日，我被邀请到沧白堂报告政协成功的经过，夜间灯光朦胧中，特务就从后面乱扔石头子，不过情况还不算严重。2月10日在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先在主席台上，我刚上台，没有几分钟，就开打了，大打特打。李公朴、施复亮和郭沫若都挨了打；

李最重，还流了血。我被逼下台，才碰到周恩来。”

第八次协进会民众大会于1月27日下午2时在沧白堂召开。到会群众3000多人，大会由阎宝航、李公朴、章乃器主持。阎宝航，中共特科传奇情报员、民建会员，又因为联合高崇民发起组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民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章乃器，1942年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后又加入民主建国会；再加上李公朴，这已经是两个党派的联合斗争了。而这一天首先发言的人是中共代表王若飞。他说，政协开幕那天国民政府就下了停战命令，经过这几天的分组讨论，关于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国大和宪草五项问题，许多基本要点已经趋于一致，这是一大成功。而昨天政协代表黄炎培等人的住宅受到非法搜查，说明蒋介石的“四项诺言”的执行仍然缓慢，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在大会进行中，仍然有特务打手们大吵大闹。李公朴从沧白堂到迁川大厦的路上也被特务们扔石头。

“沧白堂事件”不是某一个党派争取进步的斗争，而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团结一致，与反动势力展开面对面交锋的一系列典型事件。今天的党派大楼里，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台盟五个党派市级机关依然在为共同的事业而工作。这也许就是把这里作为党派大楼的意义吧。也许，每次走进大楼，我都该想想，我的工作，是否对得起那些曾经站在沧白堂讲台上为民主进步振臂高呼的先生们；而他们，是否又在我头顶三尺之处俯瞰我这个晚辈。■

（作者系民盟市委二级调研员）

挺进者陈然

——走进盟员烈士陈然同志旧居

□黄真彦



2019年7月改造后的陈然旧居

面临两江，背靠南山，沿着在车水马龙的南滨路钟楼广场后的山坡拾级而上，一栋青瓦白墙中西合璧式的两层小楼掩映在黄桷树的绿荫之中。如果无人指引，很少有人会发现这样一处隐秘的所在，更难得知在70多年前，这里是中粮公司装配车间所在地，中共重庆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曾在这里油印发行，也是盟员烈士陈然同志的旧居。

1947年2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新华日报》，导致国统区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及进步群众陷入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的沉闷政治环境中。此时，身负中共党员、民盟盟员双重身份的陈然收到了中共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和新华社电讯稿，它们有的放在信封里，有的夹在报纸内，以各种形式避开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和检查，传来

了党的声音，仿佛一座灯塔，为陈然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陈然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群众》周刊和新华社电讯稿的消息编辑、油印成无名小报，在党组织内部传看，让大家及时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让真理传播出去。无名小报发行了几期后，就引起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关注，将其正式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并成立《挺进报》特支，陈然先后担任组织委员和特支书记，负责油印工作。

当时，陈然的公开身份是中粮公司机修厂管理员，小楼的一楼是中粮公司的装配车间，二楼是陈然的家，他将自己卧室旁边的一间房作为《挺进报》油印工作室，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革命工作的保密与高效，陈然通常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油印报纸，房间门板间有许多缝隙，陈然就用厚纸塞到缝隙再糊上，又在窗后挂上毯子，电灯用黑纸做成的灯罩罩起来，这样既能降低声响又能遮蔽光线。后来，陈然发现这间屋子朝向江面，经常半夜工作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他又将工作室搬到朝向山坡的房间，这间屋子比较隐蔽，到了夜里关上门窗，挂上厚厚的门帘，一点光都透不出去。1947年7月，第1期《挺进报》正式发行，一共发行了23期，《挺进报》的发行是一场无声的战斗，它像一把尖刀刺破敌人的心脏，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让重庆的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的《挺进报》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小屋里油印发行的。

如今的展厅里，陈列着简陋的办公桌椅，见证着那个特殊时代的坚守，而陈旧的刻印工具散发的墨香似乎残留着黑暗年代的血腥味。

由于叛徒出卖，陈然不幸被捕。1948年4月22日，一群特务到达工厂门口准备对陈然实施抓捕，他们以查户口的名义闯进工厂，工人吴树华看形势不妙，就带领工友拦着特务，并故意大声问道：“查户口的来了，陈先生在家吗？”特务不顾工人的阻拦，强行闯入工厂搜查。此时，陈然正在油印第23期《挺进报》，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将枪口对准陈然。陈然与家人告别后，从容不迫、昂首挺胸地走出家门。当晚，特务就对陈然进行了审讯。陈然眉目清秀，长相俊朗，起初经验老辣的特务认为，陈然年纪轻轻，斗争经验不足，让这样一个小伙子开口并不难办。然而，面对特务的审讯，陈然只承认《挺进报》是自己一个人办的，其他的一概不说。第二天，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情报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对陈然进行突击审讯，依然没

有从陈然口中得到一句有价值的情报，徐远举恼羞成怒对陈然使用了老虎凳，陈然被折磨得多次晕死过去，两条腿受了重伤，但他仍未吐露半句实言。两天后，陈然被转移关押重庆渣滓洞秘密集中营，面对特务的再次审讯及老虎凳的酷刑，陈然毫不动摇，与特务展开了不屈不挠的狱中斗争，用坚强的意志保护了党组织，保护了同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程善谋、王朴、蓝蒂裕等10人被特务押往重庆大坪刑场执行枪决。陈然含笑和难友们告别，囚车驶过闹市区时，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丝毫没有被即将到来的死亡吓倒。特务要枪杀陈然时，他用反绑的双手猛然撕下背后“死囚”的标签，拒绝下跪，对刽子手高呼道：“人民审判你们的日子快到了，有种的就从正面向我开枪！”陈然的气魄吓得刽子手连开了三枪，见陈然仍未气绝倒下，在场的特务都目瞪口呆，下令用机枪扫射，罪恶的子弹穿透陈然的身躯，他倒在了重庆解放的黎明前夕，牺牲时年仅26岁。

展厅有三分之一被辟为文创区，无论是做旧的搪瓷杯，还是怀旧的海魂衫，上面都印着一句话：“顺境逆境，都要挺进”。顺境之时，似乎每个人都能在“愉悦”的顺流而下中收获种种“躺赢”的虚无感。而当逆境的考验来临，当其他人已经“躺”到站不起来的时候，唯有在信仰与信念的指引下逆流而上的奋斗，才配享受脚踏实地的幸福。就像陈然，他将热血和生命化作黑暗中的烛光、寒墙里的暖灯，他在黎明前倒下，却在时空中永生。

（作者系沙坪坝区盟员）



栏目主持：郭琳

民盟薪火·代有英才

□ 郭琳

重庆，是一座英雄而光荣的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和移民文化交融共生。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和关怀下，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于1953年6月建立，是团结党外代表人士的重要渠道，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文社科领域的纽带桥梁，在崇文鉴史、咨询国是、民主监督、统战联谊等方面，做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

巴渝大地，山水交融，人文荟萃。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重庆承载着民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红色记忆，也孕育了众多盟员名家与文史研究馆员的智慧结晶。民盟薪火，文脉绵长，代有英才。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的历史印记中，一批德艺双馨的民盟盟员文史研究馆馆员以笔墨为舟、以思想为翼，在时代的长河中镌刻下独特的文化印记，在时代浪潮中激荡回响。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亦是新时代精神的思考者、践行者和推动者，以智慧、胆识与情怀书写着“存史资政、崇文鉴史”的使命担当。他们以深厚的学术积淀、艺术造诣与家国情怀，成为传承中华文化、

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

“民盟名家”栏目旨在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文史研究馆馆员”为核心视角，挖掘这一群体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参政议政中的独特价值。作为兼具学者身份与民主党派成员的独特群体，他们或深耕典籍，以严谨治学赓续中华文脉；或以艺术为媒，让非遗焕发新生；或立足现实，为地方发展建言献策。

魏宇平、张孟虚、骆映村、刁焕文、徐文彬、邹绎、曾德甫、凌宗魁等民盟盟员文史研究馆馆员，大都是在文学、艺术、历史、书法、戏剧等领域有着深厚造诣的专家学者，“以笔为剑，以文载道”，这些民盟名家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他们的成就，是文化自信的注脚！

致敬先贤风骨，展现学术成就，期待本栏目能成为读者感知巴渝文化厚度、理解民盟精神内核的一扇窗口，感受民盟与文史交织的璀璨光芒！诚邀您一同走进他们的世界，追随他们的足迹，共同书写新时代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盟员篇章！■

书法大家魏宇平，诗书为翼流芬民间

□郭琳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贵州梵净山西麓，人杰地灵、文化深厚，素称书法之乡，此地先后有擅长行草的王道行、周以相，有参与“公车上书”独创书格的廖西山，各体兼能的潘鹄臣，有草书名世的吴缙卿和受慈禧太后颁赐“曾应颐和园榜题”玉印的严寅亮等书法大家。1917年1月5日，印江魏氏家族添丁宇平，魏家系书香世家，土家族，宇平的叔父幼安及长兄经略（号诩髯）皆系书家，经略文章书法造诣俱高，宇平耳濡目染，伴着墨香长大。13岁时，魏宇平离开故土，前往贵阳求学，1944年肄业于四川大学，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主报》资料室主任、副刊编辑。1947年在贵州省立中学、豫章中学任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保送到西南革大学习，后生根重庆。

为人不苟，论艺不伪

为人不苟、论艺不伪，体人之难、待人以善，凡与其接触者，都会被魏宇平的高尚人格

深深感染。他从不过生日，在他心里，他的诞生之日即“母难之日”。而在自己生日那天，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给母亲写毛笔字。他对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哭则大哭，笑则大笑”的人生境界尤为敬仰，无论穿什么，他胸前都会戴着一枚鲁迅像章，他的家中有一幅鲁迅像，旁边是他书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他家客厅的墙上，挂有一幅他自书的家训：“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太高，而把自己的人格看得太低。”与他交往的人，并非“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乡村农人、市井居民都视他为师或友。

他个性爽直，真诚助人，从不收徒，但对求学者倾囊相授，甚至赠送笔墨纸砚。有一次，一个青年上门推销宣纸，当他得知青年是来渝求学、勤工俭学的外地人时，立即拿出自己的一幅作品，让青年拿去卖了换钱。

他淡泊名利，不杂虚言。有一次，他进京当评委评选全国性书展作品，一个年轻人在他

面前炫耀自己师父的书法“贵到写一个字就可以换一辆皇冠轿车”，听闻此言，魏宇平只是笑了笑，说道：“恐怕我的一个字最多只值得到一条黄瓜哦。”当这个年轻人看到魏宇平的书法时，很是羞愧。

他刚直不阿，直言无忌，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和书坛艺苑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他用《诤言七绝十六首》对一些学艺不走正道，而专事攀附名流等不良习气进行讽刺劝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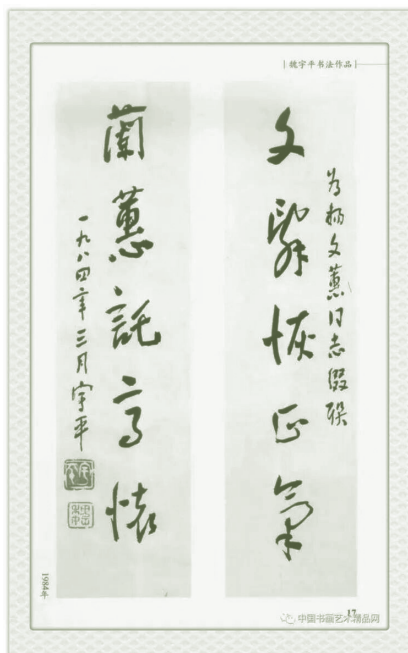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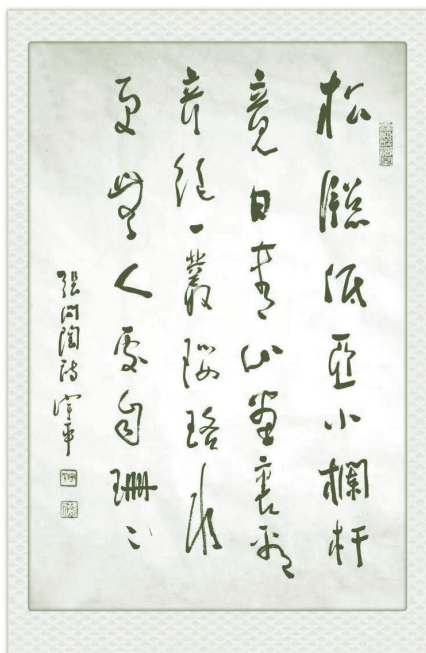
淡泊明志，心系苍生

魏宇平认为自己的个性更接近诗人，从家乡出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满怀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同情百姓大众的疾苦，用诗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

物换星移几度秋，蛮烟瘴雨满神州；何时旭日凌云出，宿雾沉霾一例收。

又向金沙港畔行，兴嗟几度恨难平；若然真有金沙港，世上应无穷困人。

1938年，他在成都赠予其妹《浪淘沙》：



烽火瘴神州，恨满心头，忍道春秋九世仇。雪耻复仇飞国步，责任吾俦。生死本无由，且莫淹留。闺装同愿换吴钩。誓挽沉沦凭热血，名姓长留。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1950年元旦，他作《新春感怀四绝》：

腰鼓秧歌乐未修，红旗簇锦映江流；万人空巷欢歌舞，大地回春一岁周。

1957年，我国的文艺创作园百花凋零，直到1976年，文艺园地方又复苏，年已花甲的魏宇平“重振精神笔又挥，千红万紫报春回；莫嫌日照将沦隐，犹洒金辉灿翠微”。

到了后期，他的诗词极少消极悲观，多是豁达乐观，如他的《观黄山人字瀑》：

静坐观飞瀑，瑰奇一大人。淡泊明其志，倾泻竭其诚。流向人间去，尽力洗污腥。蒸而作时雨，润土保耕耘。凝而为瑞雪，兆喜抱丰登。永不辞劳瘁，涓滴为苍生。人字如何写，森然惕我心。

缤纷墨妙，溢彩流芬

“静如苍松翠柏，动若流水行云，眼底缤纷墨妙，天然溢彩流芬”，魏宇平的长兄经略曾为其题词。魏宇平学习过元代大家赵孟頫圆转遒丽的“赵体”，又受清代碑风的影响，也曾长久浸淫于北碑和汉隶中。他以凝重浑朴的碑学为根基，同时又汲取了帖学的生动气韵，书法自成一家、无饰自然，笔触灵动波澜起伏，枯笔之处遒劲苍莽，湿笔之处清雅温润。

1981年，澳洲广播电台举办国际书法比赛，他的作品从万余幅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1982年，他书写的字帖《行草唐诗六十首》广受赞誉，发行量逾十六万册。1993年3月，渝中区政府访日本尾道市代表团出行，向该市政府和议会赠送了精心准备的三件礼品，其中一件是由魏字平书写的条幅：“一衣带水 中日友好 友谊长存”，此前，魏字平的诗词、书法作品早已在尾道市展出，被尾道市官方和文艺界喜爱收藏，在尾道市政府内就悬挂有魏字平的墨宝。

改革开放后，魏字平的书法墨迹流传至澳洲、东南亚及英国、美国、芬兰等地，其书法作品入选《当代著名老书法家·六人集》《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墨迹选》等。

德艺双馨，诗书比翼

新中国成立后，魏字平在重庆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担任编辑工作，后在重庆市建设局担任秘书、重庆市政公司副科长，1956年后任重庆建设工程学校、重庆市工业学校语文教师、教研组长，后被聘任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曾任民盟重庆市委委员、民盟重庆市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顾问，重庆诗词学会首任会长，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顾问、重庆老年书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艺术协会会长、中国名人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00年，他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评为“德艺双馨”会员。

93岁高龄的魏字平因患病停笔三年，但



当得知重庆市正在开展书法笔会活动时，他凝神运笔，一气呵成杜甫的《登高》。那年元月，他给一对新婚夫妇写下了他最后的书法作品——“志存高远，比翼齐飞”。正如这幅作品所表达，魏字平先生志存高远，以传统的诗词、书法为羽翼，在其高洁的文学艺术殿堂里展翼翱翔。

2010年3月3日，魏字平先生去世，三百多名书法之友从各地纷纷赶到重庆，缅怀这位书法大家、诗人。他一生所作诗词千余首和书法数万件，大多数作品都和人们对他的美誉一样留在了民间。魏字平先生践行民盟精神，以文化报国，在文化艺术领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人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将传统文化、艺术追求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理想道路。■

“天风琴人”张孟虚， “槐庵”操缦抒琴怀

□ 郭琳



古琴，又称瑶琴，至少有三千年以上历史，被尊为“国乐之父”“圣人之器”，被列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有一床明代仲尼式古琴文物，是20世纪60年代，琴家张孟虚捐赠。

捐赠此琴的张孟虚是何许人也？

放牛巷中“槐庵居”，琴瑟和鸣佳话传

渝中区通远门老城墙近旁的放牛巷，曾经的23号居所前有棵大槐树，遂命名“槐庵”，“槐庵”的主人，便是张孟虚。

张孟虚1895年5月1日出生，回族人，原名张廷槐，学名张林，笔名槐庵。世居老城的

他旧学功底深厚，熟谙重庆人文掌故，他就读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创办的东川书院，书院文化内核以“论道、讲学、修身、践履”为精神底色，强调知行合一与人格。他亲历过重庆辛亥革命，见过晚清的道台朱有基、知府钮传善，也见过起义领袖杨庶堪、张培爵。

1918年至1923年，张孟虚在重庆三益小学、昭武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巴县中学、渝女师任教国文、音乐。1924年至192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选修中国文学，包括音律通韵、曲选、中国戏曲史、普通乐学、声乐作曲等，同时还在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选修刘天华教授的琵琶、二胡及小提琴。他还跟随

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萧友梅学习音乐理论，跟随川籍琴家杨希孟学古琴。

1928年至1942年，张孟虚历任巴县字水女学校长、巴县马王乡小学分校校长、巴县园明寺小学校长、四川省立高商校及实商校国学教员，期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2年至1943年，他任成教川康绥靖公署秘书处秘书。1944年至1949年任辅仁中学、复旦中学国学教员，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教国史。1949年至1953年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副教授兼西南师范学院国乐教师。1953年至1957年任西南川剧院音乐顾问，1957年至1958年四川省川剧学校教师。

孟虚先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为擅奏古琴，倾心古典国乐，每逢“花晨月夕，茶半香初”时，他主持“槐庵琴会”，国内外知名琴人与学者应邀纷至沓来，文人琴友聚“槐庵”，宫商角羽抒琴怀。上世纪50年代，两位古琴大师先后来到重庆，都在“槐庵”留下琴韵佳话，先是琴界领袖查阜西先生携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调查组作全国琴人调查来到重庆，重庆琴人相聚“槐庵”。其后不久，著名古琴大家吴景略先生访渝，琴人们再聚“槐庵”，相谈甚欢。

“天风琴社”结知音，名士齐聚凤凰台

抗战时期的重庆，文人云集，琴家汇聚，琴人结社雅集，用古琴来表达对家国情怀的深厚情感，在抗战陪都文化史上留下了激越高亢的乐章，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难得的古琴文化高峰。

1945年2月25日，元宵节前夕，聚集在陪都的数十位文人雅士汇聚南纪门凤凰台1号一幢题有“清白家风”的杨家大院，创立了“天

风琴社”。此地是著名琴人、实业家杨少五家宅。杨少五之父杨庭五，曾是重庆商会会长，经营的“天顺祥”乃重庆第一钱庄，家藏二十余床历代名琴。张孟虚加入了“天风琴社”，在琴社成员名单上，不乏声名赫赫之士：有于右任、冯玉祥、徐元白、杨少五之女杨清如、程午嘉、徐文镜、杨次乾、王迪生、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英国音乐史学家毕铿等人。

“天风琴社”的成员也是“槐庵琴会”的座上宾，每每雅集，诸位携琴而至，以琴传心。

“槐庵”成为抗战时期至1980年代重庆古琴活动的重要中心，作为荟萃古琴家的风雅之所，“槐庵琴会”从民国延续至文革前夕，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有恢复。但如今，重庆古琴不可或缺的重要地标“槐庵”已无迹可寻。

浮生并非一孤舟，抚琴操缦余韵长

1958年8月，张孟虚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公职，1979年3月经四川省文化局复查，撤销原处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公职，恢复待遇，按退休处理，1986年8月28日，他被安排为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20世纪60年代，张孟虚捐赠一床明代仲尼式古琴文物，此琴成为中国三峡博物馆重要馆藏文物。该琴采用面底皆桐木、鹿角灰胎、栗壳色漆的工艺，琴面呈现小蛇腹断纹，配有蚌徽、象牙轸及后配檀木梅瓣形雁足。此琴制作于明崇祯癸未年（1643年），琴体龙池内刻有“崇祯癸未张敬修为君重词兄制”，是明末斫琴名家张敬修为其友人吴仁度所制，清同治癸酉年（1873年），晚清藏书家秦芑生获赠此琴，经鉴定后加以修藏并于纳音处题跋记述，完整记

载了该琴的传承历史，清光绪丁丑年（1877年），文水罗氏曾对此琴进行重修，相关记录刻于凤沼之内。

1993年1月12日，98岁高寿的张孟虚离世。曾在“槐庵”所在的放牛巷小学里，听过张孟虚聊重庆古琴的前尘后事的段云璞回忆：暮年的张孟虚已“不能弹琴了，只在意念中抚琴而已”，95岁的他仍能讲述重庆古琴往事，对后继无人深感惋惜，每每“提及古琴艺术，仍然津津乐道：琴趣、琴韵、琴理、琴德……尽管言不从心、动（比划）不达意，但他对古琴艺术的深厚感情，却是真切的。”

2010年，张孟虚的遗物被人从废品中抢救保存，有琴谱若干，短文数则，旧书和旧照，他遗留世间的琴谱和书本整洁如初，厚厚薄薄的古琴谱、琵琶谱，无论是竖列的古旧的减字谱，还是横列的现代简谱，大多用明亮又内敛的赭红和宝蓝的色调作封皮。琴谱间遗有一本古旧小书：《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乃民国25年即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所出，书中除了盖有“张孟虚”印章之外，还有若干朱笔圈点之处，写有：“浮生已是一孤舟，更被孤舟载出游……”

2023年12月，“天风琴社 余韵流长——纪念著名古琴家杨清如先生诞辰110周年展览”在重庆举办，展出张孟虚的书画作品及相关资料。张孟虚的墨迹有古琴文化与南胡曲谱的珍贵记录，如“癸未春初一九四三年，孟虚先生抄于省门”的《南胡曲谱》内容丰富，包括月夜、悲歌、良宵、汉宫秋月、虞舜薰风曲、蕉窗夜雨、空山鸟语等……

张孟虚先生毕生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传承与研究，他一生跨越晚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亲历并参与了中国古琴艺术在20世纪的传承与发展。他创作了古琴代表作《鸥鹭忘机》等，撰有《重庆古琴杂谈》《蜀中古琴》《重庆古琴》《邹容的少年时代》等文章，著有《槐庵古琴谱》《槐庵琵琶曲集》《中国音乐基本理论》《汉语字音唱法研究》，他是重庆近现代重要的古琴家、音乐教育家与文史学者，是“天风琴社”的核心成员之一，其生平与重庆古琴文化、抗战时期文艺活动及地方文脉传承密切相关，他为世人留下的作品，如他挚爱的古琴般余韵流长……

（作者系民盟盟员）

1945：发现大足石刻

□石尘、杨中秀

1945年，对于大足石刻发现历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大足石刻在此年通过乙酉大足石刻考察团的调查发现，从而得到了世人关注。大足石刻的诸多价值，在这次考察之后，得到了定位，并彰显在世人面前。

一、考察缘起

大足石刻，是大足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迄今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造像点多达75处。石刻造像开凿于初唐，历经晚唐五代的积淀，至两宋时期达到鼎盛，在明清时期仍得以延续。其中，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是一座凝固着唐风宋韵记忆的文化宫殿，它在不断吸收着丝绸之路的古老文明，在不断延续华夏文明的成果之后，以鲜明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特色，成为具

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1999年，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代表着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长达400多年时间里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

然而，大足山地之间的5万尊造像和10万余字铭文，在南宋大规模造像结束之后，数百年的明清时期基本上被记录在零星的文献之中，对于外界影响不大。1940年、1945年的两次考察，这一石窟艺术的宝库开始逐渐为世人知晓。尽管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在1940年来到大足石刻考察。但是，那个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他们的考察成果未得到及时的披露，直到近年来才得以较为完整地整理与披露。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启。这一年，中国辞典馆从南京开启西迁



乙酉大足石刻考察团在宝顶山合影

的历程，此时的负责人为年仅26岁的杨家骆（1912～1991）。在书馆的迁徙之际，他与同人相约，“此行必期于西南文化有所共享，以不负蜀中父老兄弟之所望”。1944年，时为《大足县志》总纂的陈习删（1893—1963年），将编撰的这部志书送往中国辞典馆负责印刷。杨家骆曾读《蜀中广记》略知大足，加之此次了解之后，决定“一探大足石刻之实况，盖以并世中外人士之言中国石刻史者，皆未及之。”经与陈习删协商之后，邀请组织考察团来大足实地考察。

二、考察经历

1945年4月25日，考察团从重庆北碚出发。这次参加考察团的成员，有：杨家骆、马衡、何遂、顾颉刚、张静秋、庄尚严、傅振伦、朱锦江、冯四知、雷震、何康、梅健鹰、程椿蔚、苏鸿恩、吴显齐。

其中，吴显齐作为杨家骆的学生，这次考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每天记下考察团行踪

和见解的日记，名为《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通过这篇日记，再现这次考察的详情：

27日晚进入大足城区，陈习删带队迎接，当时人员拥挤导致交通断绝，不禁感慨“这种热烈的景象，表现了战时人民对发扬文化的重视”。

28日八点，召开考察团和大足有关人士参加的会议，决定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计划：一为对石刻进行鉴定，包括命名、拓

片、绘图、摄影、编号等工作。二为编刊《大足石刻图征》一集，初步确定了九个方面的内容。三是摄制《大足石刻》影片。四是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发表考察团成果《大足石刻考察专号》。五是在北碚、重庆各地举行大足石刻展览会。六是在北碚北泉图书馆附设“大足石刻陈列室”。对上述工作任务，进行了明确的任务分工。其中，摄影为冯四知。

会议结束就奔赴北山石刻。“佛湾形如月牙”，“龕窟相连”，“这是唐宋石刻的陈列馆，可惜埋在时间的尘土里，一向默默无闻”。这一天，就在北山的佛湾、多宝塔等地，按照分工开启他们的调查工作。

29号早九点，考察团召开座谈会，确定《大足石刻考察专号》的具体9篇文章。然后继续前往北山，开启考察工作。这一天，他们注意到了北山佛湾石刻的保护，“佛湾石刻，纯用红色砂岩作材料，龕窟凿在岩上，大部份没有建筑物保护，时长日久，受水的化学作用，如风雨、气温、有机物的机械作用，已呈销蚀



大足北山转轮经藏窟日月
观音（1945年）

的趋势，加以人为的劫厄，造像和题记、碑图等，大半残毁”，并提出了修筑回廊等保护措施。

这一天考察的收获很大，行走在其间，他们仔细解读了《韦君靖碑》，持续发现造像工匠题记等，这让他们感悟到“全部的作品，

显示着仪轨的演变和作风的进展，无论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或艺术史上，都可以和云岗、龙门媲美”。而摄影工作也持续开启，特别是在“摄影的时候，因为千手观音窟，孔雀明王窟和观无量寿佛经窟都藏在殿堂里，光线暗淡，不便工作，陈议长叫暂时揭开屋瓦，拆掉窗上的木板，真是热心可佩”。

4月30日，在晨雨后出发宝顶山，并带上被盖做好过夜准备。下午两点餐后开启考察。

“如果龙岗山富于历史意义，那么，宝顶山却富于故事意味”，这是给当天考察团的一个感受。当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对宝顶山石刻之谜的初步解读，认为“本团拨开了时间的尘土，解答宝顶山石刻之谜，断定赵氏先后在圣寿寺里建大宝楼阁，后来又开凿了大佛湾南岩群像，和北岩的广大宝楼阁，辛苦了几十年，没有亲眼看见工程的完成，就逝世了。不久，元兵入川，四川大乱，这个大丛林就衰微了”。迄今，这一认识，仍是一种主流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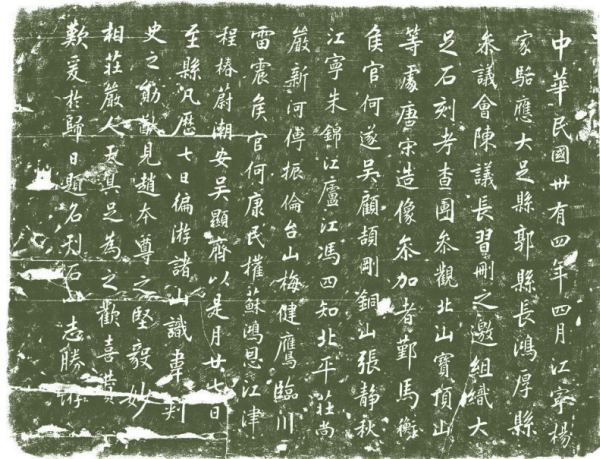
5月1日，素筵早餐，各自开启工作。其中“摄影要利用阳光，不能放过每一瞬间良好的机会，更为紧张。可惜有些深藏岩洞和建筑屋里的造

像，无法曲尽其妙的照下来”。当天，考察团深度感悟着宝顶山的造像艺术，不禁写下“这里的石刻，在形式上，多作高雕和浮雕。在组织上，多达到谨严、简洁、和谐、匀称的效果。在手法上，则多采取动态、雄浑、朴素的表现。在源流上，是继承龙岗的优良传统，而发扬光大的。这些作品，无论节奏的和谐，光线的调和动人，色调的鲜明活泼，都不让于龙岗区的造像，至于注重安定性、永久性和对比的强烈，则犹过之”。当晚，考察团回到大足县城。

5月2日，当天兵分两路，马衡、庄尚严、傅振伦去考察南山石刻，其余继续北山工作。



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局部
（1945年）



乙酉大足石刻考察团碑

在多人的视觉里，北山石刻的“这些造像，唐代的妙丽庄严，动人心魄，可算完美纯正的中国艺术作品，五代两宋的则由繁而简，由大而小，由自然而流于修饰，技巧圆熟，而神韵稍逊。这里面的代表作，对于形式的表现，制作的重心，身躯的比例，肌肉的状态，都极留意，比较同期的西洋名作，并无愧色，至于那种朴实、宁静、慈祥、崇高、厚重的气度，尤能表现浓厚的东方色彩”。

对于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迄今大众在文字讲述中，所说的大足石刻具有浓郁的中国化、民族化特色。

5月3日，日记叙述道，考察团原本计划4月30日返程，因为“盛情难却，一再展期”，当然，这里面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北山、宝顶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其诸多的历史、文化、艺术和考古等价值，值得考察团“一再展期”。此日一早，由马衡先生执笔，撰写《大足石刻考察团龙岗题名》一通，全文为：

中华民国卅有四年四月，江宁杨家骆应大足县郭县长鸿厚、县参议会陈议长习删之邀，组织大足石刻考查团，参观北山宝顶山等处唐宋造像。参加者鄞马衡、侯官何遂、吴颐颀刚、铜山张静秋、江宁朱锦江、庐江冯四知、北平庄尚严、新河傅振伦、台山梅健鹰、临川雷震、侯官何康、民权苏鸿恩、江津程椿蔚、潮安吴显齐。以是月廿七日至县，凡历七日。遍游诸山，识韦刺史之勋猷，见赵本尊之坚毅。妙相庄严，人天俱足，为之欢喜赞叹。爰于归日题名刊石，以志胜游。

同时，在早餐中，得知大足物产、人口等诸多优势，并且是三等县，不禁在日记中写下“抗战期中，在役政、粮政上，都有着优异的成绩，可见人民贡献之大”。

此日上午，主要是参观县内有关机构，下

午继续在北山石刻考察。并写下“大足石刻，经过这次的鉴定，将替中国艺术史和宗教史添上辉煌的一页”。当晚，考察团还进行了学术演讲，“阐明大足石刻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和保存表扬的切要”，参与的“听众七百余人，历时一点四十分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热烈的响应”。

5月4日，继续在北山石刻考察，考察团“工作到最后一分钟，在夜色迫近的时候，才陆续的下山”。

5月5日，开启返程，此天日记开篇写下考察团的工作数量，初步完成“影片一部，照片二百帧，部位图两种，摩绘二百幅，拓片一百通，石刻目录两种”。返程中，顺道游览石门山石刻，当晚入住铜梁。

5月6日，行至合川城内入驻。

5月7日早，乘船到北碚，临时召开座谈会总结考察成果，讨论今后计划。随后“这个有趣的旅程就结束了”。不过，日记最后写道“这十几天的旅行，已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份，在每个人的回忆里，将永远留着鲜明生动的印象”。

三、价值阐释

这次考察的成果，铭刻在大足石刻发现的历程之上，熠熠闪光。

对于大足石刻的价值认识，就在5月底，由吴显齐加以整理，形成《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一文，并在7月出版的《新中华》3卷7期“罗斯福纪念号”上刊发。该文系统、简要地整理出考察团的认识。

对于大足石刻的总体认识，此次考察团的两个结论可见一斑：一个是“堪与云岗、龙门鼎足立”。第二是“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可见，大足石刻的调查发现是中国文化史，尤其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

对于北山石刻的价值，说道虽然晚于云冈、龙门，“然从历史之延续性上观之，其价值堪称无匹”。具体龛窟上，韦君靖碑刻和造像“可补新旧唐书及新旧五代史之缺略”。观无量寿佛经变龛“精致绝伦，敦煌有此题材之壁画，而以此题材用石刻为立体之表现者，可称仅有，弥足珍贵”。转轮经藏窟造像“妙丽庄严，除敦煌壁画外，实无其匹”。维摩诘经变线刻图“实为绘画史上之重要作品”。多宝塔“为中国建筑史上之巨制”。



《文物周刊》载大足石刻考察团

对于宝顶山石刻，总体上认为“纯为南宋大足人赵智凤一手经营历数十年，其规模之宏大，系统之完整，在国内堪称第一，盖各地造像，非成于一时，亦非出一手，自无系统可言”。对于大佛湾的造像，说道，千手观音像“而此则真有千数，且从一体伸出，恍若自然天生。每手各执一物，金碧辉煌，心摇目炫；我人立像下仰视久之，见各手若在摇动，鬼斧神工，叹观止矣。”释迦牟尼涅槃图“仅半身即七丈余，头大如屋，人立头畔，仅及眉长之半……尤伟观也。”大方便报恩经变、观无量寿佛经变等龛，“法像经文相间，壁立数仞，广约二十余丈，足为古今并刻经文法像之冠”。圆觉洞造像“妙丽庄严，完整如新，极精巧”。牧牛图造像“姿态各异，生动

可爱……亦他处之所无也”。

这次考察对其后大足石刻诸多方面，都起到奠定性的作用。如“大足石刻”这一称谓，就源自于此次考察团。

考察之后，一些学者还撰写了大足石刻相关的专论等文章，后大多收入《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在其中，收录有杨家骆作《大足石刻图征初编序》，马衡《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校释》，傅振伦作《大足南北山石刻之体范》，朱锦江在复旦大学演讲的《从中国造像史观研究大足石刻》，《大足石刻电影剧本》、吴显齐《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等。这些考察的著述，在本来即将付梓的《大足县志》九卷之前，特意增加了一卷，名为《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九卷又卷首一卷》。

考察团对于宣传大足石刻起到极大的作用。在当时，就受到各大媒体的关注，如吴显齐日记5月5日记载，返程途中，“在旅店里，看到近几天的《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和《评论文化晚报》，都以显著的地位，报道本团的行踪和工作”。此外，当时在考察期间，诸多专家在大足机关和学校发表学术演讲，在北碚北泉图书馆设大足石刻图片陈列室。

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团对大足石刻考察意义重大而深远，如“大足石刻”一名，首因考察团使用（如“大足石刻考察团”）而延续至今。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团发现之后，大足石刻逐渐为世人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足石刻得到了更好地保护管理和利用，将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等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12月，以此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者系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人员，本文图片采自《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等书籍）



石窟艺术别开生面之作

——大足北山转轮经藏窟漫谈

□ 文 / 李小强 图 / 罗国家



大足城区附近的北山石刻，始建于晚唐，历经五代北宋发展，至南宋初期臻于鼎盛。其中，南宋初年营造的第136号转轮经藏窟，可谓是大足石刻杰出的代表作品，有“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的美誉！

转轮经藏窟位于北山佛湾的中部，为一个平顶长方形的洞窟，高4.05米，宽4.13米，进深6.79米，在正壁刻释迦佛夹侍迦叶、阿难与观音、大势至菩萨。右壁从内至外刻普贤菩萨与日月观音、数珠手观音。左壁从内至外刻文殊菩萨与玉印观音、宝珠观音。窟内现存造像记5件，可知雕刻时间在南宋绍兴十二年至十六年间（1142—1146年）。

一、营造历程

根据转轮经藏窟的铭文记载，可知该窟营造长达5年之久。

该窟最早的题记，以窟正壁造像记最早，即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此年，时为“左朝散大夫权发遣昌州军州事”的张莘民，“就

院镌造观音菩萨一尊”，同时彩绘完工，修设“圆通妙斋”“施献寿幡”，以祈“国祚兴隆，阖门清吉”，具体时间在绍兴十二年仲冬二十九日。这则题记可知：一是该造像题记位于正壁左侧观音头上方，可知该身像完工于此年。二是“就院镌造观音菩萨一尊”，可见当时称呼北山佛湾为“院”，约指以石刻造像所在地带作为寺院。

距离张莘民捐资造像完工后的两个月，该窟营造完工大势至等像，铭文记载当时在昌州州治大足城外的一家人，“镌刻妆彩大势至菩萨迦叶阿难共三尊□□经藏洞，永为历时瞻仰”，“祈保寿年遐院，福寿□昌”等，“今者镌妆工毕，时以癸亥绍兴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伏僧庆赞谨题”，镌刻工匠为“赖川镌匠胥安”。此则题记，位于大势至菩萨头上方，除前述可知为转轮经藏外，还可见以下几点：一是参与人，为当时昌州一带的信士。二是正壁大势至菩萨和迦叶、阿难在此年营造完工。三是虽然具体营造转轮经藏的时间不详，但是，可知此年就有意识营造转轮经藏，由此来看，很有可

能此年转轮藏已经完工。四是有僧人的出现，并在完工时举行佛教仪式。五是出现该窟造像唯一的工匠题记，即“赖川镌匠胥安”。另，与此则题记相关的造像还有两则，一则在阿难头上方还残存有一则题记，可见有“表庆”等字。一则在位于正壁中龕左弟子头顶上方，记载南山乡居住奉善陈吉同诚郭氏这一家人，捐舍净财銓彩释迦牟尼佛，题记未见年代，但是可补上述题记人名的缺失，即可知大势至和菩萨和迦叶、阿难等像，为陈吉同诚郭氏，孙男文明王氏一家捐资营造。

据铭文记载，绍兴十三年还完工文殊、普贤两像，此年，“左从事郎昌州录事参军兼司户司法赵彭年”与家人一道，捐资镌造了此二像，“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疆，皇封永固，夷夏乂安，人民快乐；次乞母亲康宁，眷属吉庆，普愿法界有情，同沾利益”，时间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六月十六日。该则造像记在左壁文殊菩萨像头上方。

距文殊、普贤像开凿三年后的绍兴十六年，开凿了数珠手观音像。造像记说道，“在城奉佛弟子王陞”一家，“谨舍净财镌妆大圣数珠手观音菩萨一尊，永为瞻仰”，“伏愿二亲寿算增延，合属百顺来，宜五福咸备，二六时中，公私清吉”，时间在绍兴十六年季冬十二日。该题记位于数珠手观音头上方。从这则题记可以推测，窟内日月观音、玉印观音的营造时间，当在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十六年之间（1143—1146年）。

从这些造像题记来看，转轮经藏窟的营造可见以下几点：

一是捐资造像的参与者为多人，官、民皆有，其中，上至本地知州张莘民，下至陈吉、王陞等平民信士。从现有造像记来看，非某一家捐

资完成该窟。

二是有僧人参与。从“僧庆赞”可知该窟某尊造像完毕，都有僧人参与举行相关的法事。

三是有意识设计以转轮藏为中心的造像窟。关于这一点，在最初营造该窟的陈吉、陈文明一家题记就显示，营造之初，就以“□□经藏洞”的形式加以设计。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可见一斑。一个是整个洞窟造像主次有序、布局对称，从窟正壁的佛像，到两侧壁的文殊普贤，再到之后的两组观音像，最后为窟口的力士像，显得井然有序，并且窟内造像题材不重复；二是该窟造像历时长达5年（1142—1146年），需要有人在此地长期坚持经营，向信众募集资金开窟造像，从题记来看，不可能为捐资造像者，而反复出现僧人的活动痕迹，应与僧人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供养人、镌匠、僧人三者之中，僧人的可能性最大，应是负责设计和组织捐资者参与造像的主要核心。

从上述来看，北山第136号窟是一处以转轮经藏为中心的造像窟，正壁和左右两壁的造像布局有序、对称严谨，是一处有计划的洞窟造像。

二、转轮经藏

站在转轮经藏窟外，首先便看见窟内正中石雕的转轮经藏，通高3.96米，为八角形，整体上分为藏座、藏身、天宫楼阁三个部分。藏座刻一须弥山，在山上有一蟠龙，伸展自若，作戏珠状。藏身下部为莲花形台座，莲台侧面雕刻一栏杆，其上攀爬十余位天真烂漫的童子，在其上雕刻八条龙柱，龙柱之间皆镂空，窟外的光线可通过其间照射到窟后壁造像。龙柱上方为天宫楼阁，亦为八面，其内雕刻亭、塔等建筑。



转轮经藏是该窟定名的来源，但是，对于这个洞窟的定名，有一个认识历程。1940年初，以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对大足石刻进行了短暂的考察，调查资料记载当时就怀疑转轮经藏窟内的中心柱为转轮藏的遗迹，并在随后的研究著述中也持此观点。这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将该窟中心柱识为转轮藏的调查史料，考察期间还留下了当时转轮经藏窟的珍贵图片资料。然而，营造学社考察的认识，受当时历史的影响，外界知之甚少，直到本世纪初，相关的史料才逐渐清晰。

1945年4月，大足石刻考察团调查后，对于第136号认为“北山心神车窟”，此称谓，是受到道教影响的转轮藏形制，后世民间一般来说皆未加以区别。其后的研究著述中，大多以“心神车窟”称该窟造像，亦有二者并称的现象。1999年，《大足石刻铭文录》定名为“转轮经藏窟”，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铭文的记载，由此该窟定名为转轮经藏窟渐成共识，其中，窟内中心柱即为转轮经藏。

转轮经藏为佛教贮藏经书的器物，相传为南北朝僧人傅大士所创造，据说他见妇孺老幼不能读诵经书，就发明“转轮经藏”，轮中收藏经卷或经名，只要转动其轮就等同于读诵经书。转轮经藏多为木结构，此处采取石刻的形式加以表现，颇为独特。

宋代，转轮经藏逐渐开始在寺院中流行起

来，成为寺院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一些宋代寺院遗迹中，还保留着转轮经藏殿，或者转轮藏实物资料。如河北省正定市龙兴寺转轮藏殿，就是为安置转轮藏而建造的殿。现重庆市合川文管所还保留一宋代木构转轮藏的铁轴座，系合川净果寺转轮藏殿遗物，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建立。对于巴蜀地区的转轮经藏营造，据学者梳理，可知北宋时期有成都天宁寺，南宋有简阳白塔寺、洪雅县月珠寺、简州甘泉县安乐院、汉州德阳县安国寺以及合川净果寺等。甚至可以说，在当时作为大型的寺院之中，都是一种必备的设施。

由此来看，在当时的北山雕刻转轮经藏，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年有僧人居住于此，并将此地作为修行的寺院，因此，作为当时寺院常见的转轮经藏，僧人有意识以石刻的形式将其刻出，很可能作为以北山石刻为主体的寺院形式的一个中心。

三、石刻宋韵

行走在洞窟之内，仰望正壁和左右两壁的造像，那些极具匠心的石刻作品，让人陶醉不已，流连忘返。

在洞窟的正壁，中间主像为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双手放于胸前作说法状，身后有圆形火焰身光和头光，头有螺髻，发出两道毫光，在窟顶部绕四圈后射到窟口处。左

右两侧分别为观音和大势至，皆头戴花冠，密饰璎珞，观音一手提净瓶，一手拈杨柳枝，大势至双手握莲花斜置于右肩处。正壁左右，还刻有童子和四身供养人像。

在窟左右壁，由内向外分别有三组造像，既单独为一龕，又浑然一体。

第一组左右对称刻文殊和普贤，皆头戴花冠，胸饰璎珞。

文殊是佛教象征智慧的菩萨，左手握一经卷，右手在胸前结印，双目微睁，双唇微闭，似正在深思，神态中又流露出颇富主见的气质，体现出博学多闻的素养，极具学者风范。文殊座下是一青狮，狮口阔张，四脚如柱踏于地上，旁站立一身着甲冑的狮奴，正用力拽住缰绳。普贤菩萨以理德第一著称，右手执一如意放于膝间，结跏趺坐于大象背负的双层仰莲台上，脸颊圆润，目光下视，双唇轻翕，呈现出一种含颦欲笑、具有东方女性美的微妙神态，给人以娴静、端庄、秀雅之感。莲座下为一白象，旁站立犷悍剽武的象奴，紧握象绳。两龕像中狮奴和象奴的威猛形象，以反衬手法衬托出文殊、普贤的文雅、超凡的气质。

第二组对称刻玉印观音和日月观音。皆头戴花冠，胸饰璎珞。玉印观音手持宝印，面容端庄祥和，飘带舒展自如散于台座上。日月观音结跏趺坐于方形金刚座上，因其手托日、月，俗称为“日月观音”，全身帛带飘逸，极具装饰美感。两身观音造像注重线与面、方与圆、繁与简的和谐统一，繁复的镂刻花卉纹宝冠与简约的丰腴面颊相得益彰，不仅显现出肌肤的细腻柔美，更衬托出观音的端庄温和。

第三组对称刻如意珠观音和数珠手观音。前者面带微笑，双手捧一宝珠；后者轻拈数珠于胸前，密饰璎珞，造像端庄温和，与世人俗

称为“媚态观音”的第125号数珠手观音，表现手法殊异。

窟门口站立的两身力士像，瞪目露齿，肌肉暴突，手持棍铜，正守护着这一神圣的艺术殿堂。

这一窟造像，总的来说，是一佛八菩萨为主的题材组合，也是窟内造像的主体。转轮经藏窟内二十余尊造像各具特色，郭相颖先生说道，这窟造像既有雕塑本身应有的体、面关系，又有宋代绘画中熟练运用的“线条”，显示出了独特的民族雕塑风格特色。整窟造像力求统一中求变化，既有精巧的细部刻画，又有完美的整体效果。表现手法丰富，毫无程式化之感。

总之，这窟造像雕工精美，有机地融合了婉约温柔之美和崇高庄严之美，从而真实地展现出了宋代的审美理想。

四、奇特的一佛八菩萨组合

800多年以后，对于转轮经藏窟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然而，一些疑惑也在世人的言语中得到探讨，这其中，就有一个疑惑值得关注，为什么在此时期的大足石刻转轮经藏窟内，会出现如此奇特的一佛八菩萨组合呢？

转轮经藏窟造像，主体上为一佛八菩萨和转轮经藏的組合，此种組合形式，在石窟寺艺术中极其罕见，可谓是目前仅发现此处。缘何出现此組合形式，在此，通过对一佛八菩萨的組合形成的探析，略窥一斑。

转轮经藏窟的一佛八菩萨組合形式，不见于佛教经典记载，亦不是常见的八大菩萨的組合形式。转轮经藏窟内的八大菩萨組合，正壁佛与观音、大势至两身菩萨的組合，以及文殊、普贤的組合出现在龕窟两侧壁的表现形式，极为常见。而最为奇特的是在窟内出现有五身观

音像，除正壁之外，两侧壁各有两身观音，此种组合形式甚为独特，极为罕见。其原因，推测与观音信仰在宋代时期的大足一地兴盛有密切的关系。在此，从单尊观音和组合观音这两个角度，略作探析。

一是两侧壁的观音造像在大足一地的盛行情况，

玉印观音，主要见于北山石刻之中，其最初见于北宋晚期的第211号龕。进入南宋初期，玉印观音较多雕凿。除136号之外，具有代表性的有第118、126、274号以及多宝塔第122号。从大足北山石刻玉印观音的表现形式来看，持印方式大多为一手持印，一手持印带。皆为造像主尊，可知玉印观音在两宋时期的大足一地，已经作为一种信奉题材开始雕凿。

不空羼索观音，至迟在五代的大足北山石刻中就开启雕凿，在宋代时期成为大足观音造像的主要题材之一。这自然是转轮经藏窟内出现不空羼索观音的一个重要外在条件。

二是十圣观音流行的影响。所谓十圣观音，即在一个龕窟之内，雕凿十身不同持物的观音，其在大足一地最初的形态表现为以北山第180号为代表的十三观音变相，其后逐渐形成十身观音的组合。雕刻于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石门山第6号十圣观音洞，其间有宝珠手、数珠手观音。妙高山第4号十圣观音造像中，有手持如意珠、数珠、羼索的观音。在观音组合中，数珠手观音尤为受到设计者的喜好，据调查，分别出现在北山第180、105号，石门山第6号、妙

高山第4号、峰山寺第3号、普和寺第3号、佛安桥第2号等龕窟之中。另，如意珠观音，见于北山第180号、妙高山第4号等之中。仅此来看，在转轮经藏窟内出现具有自身特点的观音组合就不难理解。也就是说，从这些观音组合的造像来看，其对于北山转轮经藏窟出现的观音组合，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转轮经藏窟的五身观音来看，题材不重复，显示出造像者有意识的设计与布局，这一点，还可以从窟左右的造像得以看出，由内至外，第一组文殊与普贤相互对应；第二组，不空羼索观音与玉印观音相互对应，二者皆是结跏趺坐于石台上；第三组，如意珠观音与数珠手观音相互对应，二者皆是站立。这三组造像，对应的造像龕形制基本相近。这些对应关系，体现出该窟造像不是以信众为主体进行雕凿，而是与在此长期经营的设计者有极大的关联。

由此也可见，转轮经藏窟的八大菩萨的组合与该窟营建者的总体策划有关，系根据当时民众的喜好所营建的造像布局形式。其八大菩萨的表现形式，在石窟寺中极为稀见，由此进一步而言，八大菩萨与转轮经藏的组合形式，在石窟艺术中更是凤毛麟角。

如今，北山转轮经藏窟静静地在大足北山佛湾之中伫立，以其流畅的线条、精致的花纹、娴静的身姿、柔和的面容，向世人展示着这一时代的审美理念，叙说着宋代人们的理想与向往。

（作者系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龚晴皋妙语释图疑

□ 吴 文

上回说道，嘉庆皇帝在成亲王府一时兴起，钦点了巴蜀才子龚晴皋为“字状元”，因对其来历底细尚不明了，故而未便即刻召见，乃着成亲王多加察访，再作定夺。成亲王领了口谕，便将龚晴皋以门客之礼，安置在自家慎墨别院之中。

龚晴皋住进王府别院后，成亲王但凡得闲，必来与他谈文论书，或品茗对弈，或挥毫泼墨；时而联句吟诗，时而古今评点。几番往来，成亲王除赏其文墨之余，终见其学识品性，渊博如海，高洁似松，堪有大用。不由暗自赞叹：“此人不仅当得起字状元之美誉，更是经世济民之国家栋梁。”遂打定主意，要择机向圣上举荐，以求破格擢用，使贤才不致埋没。

成亲王虽对龚晴皋青眼有加，终究是王爷之尊，平日不是上朝议政，便是进宫问安，间或还要与王公大臣往来应酬，哪似寻常闲散之人，终日与门客谈天说地？因此，龚晴皋倒也得了许多清闲，每每独坐书房，或展卷临帖，或挥毫作画，狼毫起落，墨花飞溅；玉版铺陈，

烟云满纸。写至酣处，真正是笔走龙蛇惊风雨，墨泼山水动乾坤。

这日，成亲王上朝面圣去了。龚晴皋久在房中，颇觉烦闷，便往后花园散心遣怀。行至后院柴房处，忽闻得里面人声鼎沸，呼卢喝雉之声不绝于耳。龚晴皋心下好奇，暗道：“不知这些人在作何勾当？且去观上一观。”遂轻移脚步，隔窗窥视。却见几个杂役围坐一处，掷骰赌钱，好不热闹。有的抓耳挠腮，有的捶胸顿足；赢者眉飞色舞，输者面如尘土。龚晴皋虽是个读书人，却也知晓市井百态，只是素来不喜此道，略看片刻便转身离去。

行至花园门首，忽闻里面笑语盈盈，莺声呖呖。定睛一看，原是王府格格带着一众丫鬟在园中嬉戏。龚晴皋想起《论语》古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又念及自己客居身份，恐有不便，赶紧悄然退回。

返至书房，犹闻柴房处喧哗之声隐隐传来。方才所见赌徒们之情状，竟在眼前挥之不去；或喜形于色，或怒发冲冠；或手舞足蹈，或呼

天抢地，这市井百态，活脱脱一幅民间游娱图。龚晴皋忽然灵光乍现，暗道：“何不将此情此景绘于纸端？既可记民间风物，又可消此永昼。”想罢，展纸研墨，挥毫作画，轻描淡写间，便将赌徒们的神态勾勒得惟妙惟肖。

正自赏玩间，忽见成亲王踱步而入。龚晴皋忙起身相迎。成亲王尚未开言，先被案上墨迹未干之画吸引。细看之下，不禁拍案叫绝。原来，成亲王平素亦好这樗蒲之戏，今见此画中人物：或拈骰欲掷，或伸颈观望；或喜上眉梢，或愁云满面。最生动者莫过当中那掷骰之人，双目圆睁，神色亢奋。端的是个个栩栩如生，令人观之恍若置身其中，不觉手痒难耐。越看越是心喜，忽然发现画上既无题款，又未钤印，遂问道：“龚状元此画神妙非常，为何不加上印信？再者，这般佳作岂可无名？待本王为它题名《掷骰图》如何？”

龚晴皋闻言暗思道：“此不过信手涂鸦之作，题作《掷骰图》虽显直白，倒也贴切。只是这等游戏笔墨，何须郑重其事加盖印信？”然见成亲王再三催促，不便推辞，只得提笔在画上题写“掷骰图”三字，又落款署名，而后开启印匣，取出一方青田石印，蘸了朱砂印泥，在落款处端端正正钤上。

成亲王见画作已题款用印，不由抚掌大笑：“妙哉此图！来人啊，速将此画送去细心装裱，本王要将其悬挂于别院厅堂，与历代名家墨宝并列！”龚晴皋听罢，再看自己这幅随意之作竟被王爷视若珍宝，不由莞尔，心中暗道：“王爷戎马半生，倒也是个率性之人。今日兴之所至，他日或许便抛诸脑后了。”故而，不以为意，只随王爷高兴便罢。

不几日，那幅《掷骰图》已被装裱得金镶玉嵌，堂堂正正地悬挂在别院厅堂最显眼处。成亲王如此安排，一则是为时常观赏把玩；二则也是要向往来宾客炫耀，不仅自己书画造诣不凡，就连府中门客亦非等闲之辈。更有一层深意：龚举子在王府盘桓多时，却始终未得面圣机缘，实在可惜。王爷心中盘算，正欲借此画图引动圣心，好教皇上想起尚有一位“字状元”赋闲王府，至今未获一官半职。

这日，成亲王终于寻得机会，借商议皇家私事之名，将嘉庆皇帝请至王府。圣驾甫至，不待成王爷提议，嘉庆却先说要往别院赏玩字画。成亲王闻言暗喜，这正是他期盼已久的良机。

君臣一行来到别院正堂，方入门槛，那幅《掷骰图》便赫然映入眼帘。嘉庆皇帝驻足画前，左观右察，上下端详，足足看了半盏茶的工夫，方才开口问道：“皇兄，此画出自何人之手？”

成亲王连忙躬身答道：“回禀圣上，此乃陛下钦点的‘字状元’龚晴皋所作。”他满以为皇上定会大加赞赏，腹中早已备好了一篇荐贤的锦绣文章。谁知圣意难测，嘉庆皇帝竟长叹一声，摇头道：“可惜啊可惜，此人怎会作出这等画来？皇兄还将它与先贤墨宝并列，岂不有辱斯文？”

成亲王闻言，心头如遭重击，面上惊慌之色难掩，暗自思忖：“此画笔精墨妙，栩栩如生，皇上为何如此评价？”遂诚惶诚恐地向嘉庆问道：“圣上，呃……臣惶恐，不知此画错在何处？臣，驽童钝夫，有眼无珠，还请圣上明示。”

嘉庆皇帝指着画说道：“此画构图精妙，笔墨鸾凤泊，可惜画龙点睛之处，却秃笔拙墨，凭空生造，毁掉一切！”

成亲王心中一时五味杂陈，赶紧打拱叩首道：“臣，看朱成碧、私视目盲，不胜震惶，还请皇上补偏救弊，以正视听。”

嘉庆皇帝遂指着画中掷骰之人，对成亲王道：“皇兄素日也好此道，且看这画中碗内六个骰子，已停五个，点子分明是一、二、三、四、六，独有一个尚在旋转未定。此般画法，可谓颇具匠心，引人遐思，倒也别致。若那旋转的骰子落定为五点，便成一、二、三、四、五、六的大顺之局，满盘通吃。再看这些赌徒，虽神色各异，却都面露惧色，显是不愿见五点出现。这般描摹，可谓传神写照，无可指摘。”随后，皇帝话锋一转，指着掷骰之人道：“唯独这掷骰者，右手五指尽开，嘴巴大张，分明是要喊个‘五’字出来。皇兄不妨试想，赌徒欲唤点数时，岂能如此耶？这‘五’字乃是闭口音，须得双唇微合方能道出。这般画法，岂不是违背常理？”

这一番剖析，说得成亲王哑口无言。他试着张口喊“五”，果然不成其声，这才恍然大悟。心中暗恨：“这龚晴皋怎会犯此等差错？今日在圣前出丑，只怕要误了前程也。”

嘉庆见成亲王默然不语，反而问道：“这龚晴皋现在何处？朕倒要当面问问他，为何在关键环节处置得如此糊涂？”

成亲王闻言，慌忙躬身答道：“龚……龚秀才现仍在府中。”刚刚还口口声声的“状元”称谓再也道不出口来，也忘了龚氏已然举人，竟以“秀才”相称，足见其心内慌张。随即又补充道：“臣这就命人唤他前来面圣。”说罢，急命左右速去传唤。

龚晴皋正在书房品茗读书，忽见王府管家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急声道：“龚先生，祸

事至矣！祸事至矣！圣上震怒，着您即刻前去问话！”

闻听此言，龚晴皋犹闻晴天霹雳，手中茶盏“咣当”跌落，摔个粉碎，心中暗惊：“哎呀呀！不知何处触了逆鳞也？”当下不敢耽搁，栗栗危惧，随管家前往。途中低声询问缘由，管家念及王爷平日待其亲厚，便三言两语将方才之事道来。龚晴皋听罢，顿时冷汗涔涔，心中翻江倒海：“此番若应对不当，轻则皮肉受苦，重则性命堪忧。”

不过一幅画尔，龚氏这般想法，是否过于？列位看官，有清一朝，尝有文网之狱，康熙一朝“南山集案”历历如昨，雍正之时，徐骏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竟惹得身首异处。此时龚生，自是心胆俱裂，恨不当初也。

行至正堂，龚晴皋不敢抬头，当即伏地叩首：“臣龚晴皋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嘉庆帝淡淡道：“平身。”

龚晴皋谢恩而起，垂手侍立，静候圣谕。

皇上尚未开金口，成亲王便代行发难，直奔主题道：“龚先生，此画中掷骰之人，分明是欲唤‘五’字，然‘五’乃闭口之音，为何却画作张口之状？如此有悖常理，却是为何？”

龚晴皋听得亲王之言，又拿眼偷觑圣上，见圣颜未现怒色，王爷语气亦尚平和，心中稍安，暗道：“原来是这般计较！王爷及圣上并无怒颜，项上人头或可无虞，回答不周，只怕难免屁股开花……”想至此节，那“屁股开花”之“花”字赫然蹦出，顿时灵光乍现、豁然开朗，赶紧跪下答道：“回圣上万岁，回王爷千岁，画上这人此时喊‘五’，必然是喊不出来的。”

听龚晴皋如此回话，王爷一时面带怒色：“汝

却也明白！然究竟何意耶？是要蒙皇上和本王不懂掷骰子乎？”

龚晴皋赶紧叩头，又镇定回道：“圣上万岁、王爷千岁，乞求明察，草民绝无蒙蔽之意，掷骰之人画嘴成这样，实乃颂扬圣德之作，且容微臣详禀。”

听得此说，成亲王稍有缓和，道：“汝且细细道来。”

龚晴皋略整衣冠，从容奏道：“臣本蜀人，蜀中博戏，因五点状若寒英，故素来将骰子五点称为‘梅花’，简呼为‘花’。赌局之中，唤点必呼‘花’而不称‘五’也。盖因‘五’谐音于‘无’，口彩不佳，寓意不吉；而‘花’者，则象征花团锦簇、春满乾坤之意也。”说到这里，龚晴皋指着画中人继续道：“此人张口欲呼，非为‘五’字，实是要高呼一个‘花’字。微臣特将其口型略作夸张，正是要借这喊‘花’之嘴，寄寓‘花开富贵万年长，锦绣山河永安康’之意。此乃微臣一片赤诚，愿我大清江山如花似锦，永享太平也！”

嘉庆闻言，龙颜大悦，抚掌笑道：“好一个‘花开富贵’！龚举子不仅书画双绝，更兼才思敏捷，忠心可嘉。”转头又对成亲王言道：“皇兄，看来是朕误会矣。龚举子此画，实乃祥瑞之作也。”

成亲王转怒为喜，连声赞道：“龚状元寓深意于笔墨之间，果然匠心独运。妙哉！妙哉！”

嘉庆皇帝听罢，亦抚掌笑道：“龚举子快快平身，此画别出心裁，‘花’字之说更是妙趣横生，不负‘字状元’之名。朕今日不但得

见佳作，更知晓了蜀地风俗，实在是获益良多。”

成亲王见状，此时还不趁热打铁，更待何时？乃在旁提点道：“龚状元，圣上金口玉言，今日当面钦点你为‘字状元’，还不速速谢恩？”

龚晴皋闻言，当即整衣肃冠，行三跪九叩大礼：“臣龚晴皋叩谢天恩！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圣上知遇之恩也！”

至此，龚晴皋这“字状元”的名号才算真正坐实。

礼毕起身，嘉庆帝兴致盎然，当场考校起治国之道。君臣之间，言来语去，龚晴皋尽皆应对如流：

论政事，引经据典，剖析时弊；
谈经济，条分缕析，切中肯綮；
说民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讲诗文，口吐珠玑，妙语连篇；
评书画，见解独到，鞭辟入里。

君臣一番问答，如御前庭对，嘉庆皇帝龙心大悦，当即降旨：“龚状元才学过人，着即授‘翰林院修撰’，入值上书房，随时听候差遣。”

自此，这位巴蜀才子便以一幅《掷骰图》为契机，凭真才实学赢得圣心，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后人谈及此事，都不禁叹服其随机应变之智，更钦佩其满腹经纶之学。这正是：

丹青一幅起波澜，
巧解花字龙颜欢。
若非胸中藏锦绣，
泼墨岂可定状元。

（作者系民盟盟员、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本文根据民间传说编著）

一捧青绿终难忘

□程 华

我只对清水粽有兴趣。市面上粽类多如过江之鲫，清水粽倒成了小众稀罕物。不过，如今网络发达电商众多，清水粽还是能搜罗到的。每至端午总得买点，偏偏入口兴味索然，草草咬两口便放下了。

我清楚，我为什么这样。

小时候可吃的不多。端午将至，家家户户都自己包粽子并视为隆重仪式。父亲来自北方，包饺子尚可，包粽子一窍不通，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美美享用我母亲包的粽子。

与拙于烹饪的父亲相比，母亲简直无所不能：腌咸菜、做泡菜、推汤圆、烧青蛙、爆田螺……食材匮乏，愈显她身手不凡。母亲少小离家就读护士学校，后进入部队，再后来转业成为厂医，按说她呆在乡间父母身边的时间屈指可数吧，天晓得怎么就会捣鼓那么多玩艺。这个问题直到如今我也没想出个答案。

就说母亲包粽子，清水粽，那叫一个利索。浸泡过的糯米，湿润润地装满一搪瓷盆子，加

上一叠不知从哪弄来的青悠悠粽叶即全部食材；一小捆细麻绳，一双木筷子，一只粗瓷勺子，便是全套工具。母亲面容庄重地坐下，我也乖巧着搬根小木凳挨旁边。她取了粽叶，横向倾斜着向内卷入，再将后面粽叶朝外包卷过去，咦，一翻一卷就弄出了一只形似漏斗的物件。没待我看清，她拿勺子舀一勺糯米倒入“漏斗”，一手握紧漏斗，一手拿木筷子“嚓嚓嚓”将米捣几下，而后用手重重压上几压。我观察到她的嘴角因为用力抿得紧紧的。“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为了纪念屈原呀！”未等母亲说出下文，我赶紧接嘴。尚读小学的我，很为能在母亲面前显示我那点可怜的知识储备而自豪。

你一句我一句说笑间，紧接下来的动作让我眼花缭乱。但见她十指上下翻飞，一只粽子便初具雏形。随后扯一截麻绳左绕两下右缠两下，不过几秒，粽子便结结实实握在了手中。我兴冲冲抢过一把粽叶打算如法炮制，可惜看似简单的动作到手里完全走样，粽叶卷过去卷

过来终是各自为政，且屡屡与糯米分崩离析。如是折腾数番，我终于失了耐心，丢下粽叶拂袖而去。

待我从楼下疯玩回来，一大盘青绿的清水粽已热腾腾出锅。我一声欢呼，不顾烫手提起一只，一边吹气一边拿剪刀剪断麻绳，迫不及待剥开紧裹的粽叶，呼，顿时糯米与粽叶的清香相互缠绕直钻鼻孔。慢点，小心烫！母亲絮絮叮嘱间，一只粽子已被消灭。

母亲包的粽子特别紧实。隔水蒸熟的粽子彻底改变了糯米在盆中一颗颗一粒粒的散漫状态，似乎被什么特制模具压过，变成光滑得看不出米粒原状的圆锥体。那时候白糖得凭票供应，不可能放开吃的，白粽子也一样吃得眉开眼笑。没白糖有什么呢，糯米本来就有甜味的呀。张嘴一咬，软糯又弹牙，真真满口清芬，余味袅袅。

母亲是个童心未泯的人，有时兴之所至会包很多小粽子，长度不过中指的两个指节，小巧玲珑十分伶俐。用一根麻绳串成一串，拎在手里抖一抖，像一串活蹦乱跳的绿蚂蚱。我刻意提了“蚂蚱”踱去隔壁家，说是串门，实则显摆。邻居孩子多，四个，两男两女，经常拿黑乎乎的小手抓东西吃。在四双眼睛闪闪发光的注视下，我嘚瑟一阵方昂头回家，心满意足地让母亲投之入锅。当然，“蚂蚱”出锅后，母亲总让我提上一两串给隔壁那四个拖鼻涕小孩送去。

从小到大，若干次想学会这门“手艺”。不就几个简单动作吗，有什么难学。可是竟然学不会。到后来我彻底放弃。母亲勤快又能干，永远都有使不完的力。有母亲在，我不会又有

什么关系。我心安理得享用每年一度的端午美食，直到有一天，再也吃不到母亲包的粽子。

那个端坐一盆糯米旁边，变魔术般飞快地变出一只只粽子的人，再也见不到了。多年来，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无数画面，其中一幅便是母亲抿紧嘴唇，手上一用力便扎好一只清水粽的场景。

母亲是炎夏走的。从次年端午起，我几乎不吃粽子了。每逢端午节前，市面上会涌出许多粽子，礼盒的、散装的，记得有个比较出名的品牌，粽叶黄绿，粽体呈淡酱色，裹入蛋黄、豆沙、鲜肉等食材，五花八门颇得受众青睐。说句公道话，味道咸鲜还是不错的，只是那米松松散散不团结，嚼着一点不Q弹紧实，于是敷衍几口便失了兴趣。这两年粽子种类更多，档次愈发走高，连鲍鱼大虾牛肉黑猪肉都悉数收入囊中，价格自然一路上扬。

读小学的儿子喜欢拿粽子当早餐当点心，无论什么品类皆吃得津津有味。每拆一个，他便开心地给我看，这个是蛋黄猪肉的，这个是豆沙莲蓉的。在小孩眼里，新奇的好玩的就是好的。他的勃勃兴致感染了我，我从最初不屑到半推半就，到渐渐开始接受。其实也算不得接受，只是喜欢坐旁边看他眉飞色舞的模样罢了，只是喜欢和他一起分享的氛围罢了。

心里终究惦着那一口清甜。无味之味，味尤深浓。世上情意万般，最醇厚绵长的，恰恰都是看似平淡的，一如当年那只什么也未添加的清水粽。无论再简单的食材，再素朴的滋味，一旦裹入至亲的气息，烙上爱的密码，那就必然永世相伴，如何也是忘不掉了。■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供职于重庆市公安局）

游圖葡說

黄桷树下是我家

□游 江 / 图 葡 萄 / 文



中山四路的黄桷树，此树的根成了外地人打卡拍照的新景点

一提到什么树，就想起重庆？它有特立独行的个性，在重庆，随处可见，它破石而生，枝干健硕，碧叶葳蕤，盘根错节，缠紧坚硬的岩石、抓牢脚下的土地；有的则爬坡上坎，从悬崖的石缝中探出纤弱的枝条和繁根来，新叶虽稀疏，但青翠欲滴；其他树木通常在秋冬落叶，而它却在春季落叶，一阵春风，一场春雨，一地金黄，于是，重庆的春季便是满目“半入暮春半入秋”的景致。

1994年初秋，我来到民盟先贤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社会大学求学，一走进校门，迈上十几级台阶，就看见一棵硕大的“迎客树”，它的树干粗壮、绿叶茂密，盘虬卧龙般的树根像一条条章鱼有力的触须，从石阶上的缝隙里钻出来，擒住根须染指处，它强烈地吸引了我的视线。

老师说它名为黄葛树，本地人喊它叫黄桷树，因为重庆方言中“葛”与“角”同音，比如“角落”，重庆人喊的是“guo落”，所以“黄桷树”这个喊法是“重庆造”；重庆人还觉得既然它是树，就应带个“木”旁，所以就这样执着地喊开了。

毕业后，我来到位于中山四路81号的重庆青年报社工作，那条幽静的街道有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地特园，有桂园、周公馆、戴笠公馆等抗战遗址，街道旁最醒目的是一棵棵壮硕的黄桷树，沿街建筑檐口控制了高度，与黄桷树形成黄金视觉比例。炎热的夏季，走在这条重庆“最美街道”，黄桷树华盖如伞，树树相连，走在斑驳清凉的树影里，身心欣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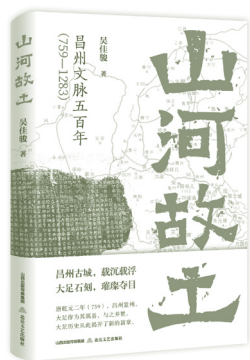
黄桷树耐贫瘠、耐旱、耐高温，其寿命可达上千年。在城市街道，虽然空间限制，受到人为因素干扰，但依然能时不时看见挂牌保护的老黄桷树，其长久的生命也让它成为见证城市变迁的“活历史”：大足宝顶山，一株黄桷树的根环抱一尊南宋石刻造像，形成“树包佛”的景观；忠县磨子乡村美术馆，居于山顶，由废旧铁匠铺改造而成，馆外有一棵硕大的黄桷树屹立，居高临下，远眺群山；綦江东溪古镇，明朝成化年间的青石板古道穿场而过，5000余棵黄葛树密布成西南地区最大的黄葛树群，构成“小桥、流水、人家”的诗中意境；九龙坡区民主村片区更新中，原有的百余棵老树被全部保留保护；高新区香炉山街道，清代古桥“会家桥”东侧矗立着一株百余岁的黄桷树，古树古桥相容相依；北碚金刚碑古村落修复时，建筑将古树拥入楼中，树根延至室内，树干穿楼而过，“树屋共生”；黄桷垭老街的“灵魂”——古道两旁的古黄桷树和巴渝民居、文物故居构成独特的历史骨架；江津黄桷故道，曾是津城的古驿道。这条古驿道两旁生长着2600多株大黄桷树；荣昌在旧城改造中，为保护古黄桷树，放弃建商场，转而修建黄桷树广场……

重庆民间有童谣：黄桷树，“黄桷丫，黄桷树下是我家”。此时此刻，我正书写黄桷树时，书房外，隔窗相望的几棵黄桷树有的枝叶茂盛有的落叶缤纷，雨过天晴，群鸟隐藏在枝丫之间，婉转鸣唱……

（游江，漫画家；葡萄，本名郭琳，作家。二人均系民盟盟员）

用文字丈量山河故土

□吴佳骏



屈指算来，我从17岁开始写作至今，已逾廿年。这廿余年来，我虽先后出版了近20部书，却没有好好地为故乡大足写一部书。十年前，我倒是写过一本关于大足石刻的小册子，书名叫《莲花的盛宴》，但该书远不能涵括大足的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和人文风俗等内容。

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作家需有一个写作“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写出的作品才会有血有肉，厚重而深刻。换句话说，唯有找到“根据地”的作家，才能拥有创作的“母题”。否则，写得再多，都是瞎写。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没有个靶心。

那么，我有创作“根据地”吗？不知道。说没有吧，好像不确切；说有吧，好像又没有建立。若干年来，我就这么在似有似无、似真似幻中蹉跎了岁月。时间真是残酷啊，弹指之间，我就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中年。谚语云：“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这是大实话，听后让人心生悲凉。但于我而言，又似乎还不到“万事休”的时候。连桑榆之人尚且“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更何况我

这样的中年人呢。《金刚经》上说：“众生皆苦，万相本无，唯有自渡”，诚哉斯言。人活于世，归根结底还在于“自渡”。当然，倘若在“自渡”的同时，又能“渡人”，那就更是善莫大焉了。古往今来，这样的智者还是蛮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赵智凤。他开凿“宝顶山石刻”，初衷是为“自渡”，但直到如今，他所留下的这笔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依然在“渡人”。因此，赵智凤是不死的，他活在历史长河中，活在文化史册中，也活在后来者的心中。

我生为大足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活的地方，曾经诞生过赵智凤。可别小瞧了这个问题，一个地方，出过什么人和没出过什么人，是大不一样的。就像一个人，出生在什么环境，也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从小就有追求、有教养、有担当，明是非，讲正义，成年后对社会贡献大；有的人自幼就顽劣成性，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甚至偷鸡摸狗，纸醉金迷，为非作歹，成年后危害社会，做人做事都没有底线。究其原因，皆可从生长环境中找到根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便是佛家所谓的因果。好因结福果，

坏因结恶果，概莫能外。

扯远了，还是说回这本书。数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学者熊培云先生的著作《追故乡的人》。翻阅书中的图片和文字，我如遭电击，那一张张拍自作者故乡的黑白照片，勾起了我对过往生活的无限回忆，心底的潮水汹涌澎湃。合上书页后，我陷入了沉思。置身于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的步伐已很难跟上时代发展的进程。只要我们打开手机，瞬间就会被互联网所包围。一机在手，遍览全球。哪怕你身处偏僻的村落，也好似站在世界的中心。我们所了解到的资讯，是赵智凤无法想象的，也是赵智凤的先辈们无法想象的。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每个人都被网络安装上了无形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何却丧失了赵智凤那样的理想和激情，缺乏赵智凤那样的愿力和创造力？我们发明、制造了那么多先进的东西，有几样是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我们的大脑中充塞了海量的信息，有几条是有价值、有营养的，对人的审美建构和人格提升是有益处的？当代人貌似博学，个个都是知识分子，可又有几人的知识是成体系的，有建设性和思想性的？碎片、碎片，一切都是碎片。碎片的布料可以缝制出一件“百衲衣”，但碎片化的信息却绝难修补一颗千疮百孔的灵魂。

就拿我来说，我虽以出生于大足而自豪，但我真正知晓大足吗？我能说出大足的一条河流、一条小巷、一段城墙的历史吗？不能。我的自豪不过是沾了老祖宗的光。认清这点，我的自豪瞬间转成了自卑。于是乎，我有了要深

入探寻大足文脉的强烈冲动。我可不想当外地友人向我问及大足石刻的问题时，我能告知对方的，仅仅是解说词上的那点套话。

生而为人，是要知羞耻，懂敬畏的。不然，你有什么资格大言不惭地自称文化人。退一步讲，即使不谈文化，仅从职业而论，不管你是从政、从商、从教，假如对自己故乡的历史一问三不知，又怎能做到脸不红、心不跳地向他人侃侃而谈，俨然老僧说法、仙人说道。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好似回到了唐宋时期，整日在昌州的白天和夜晚游走，我听说过战乱声、哀鸣声、求告声，也听说过读书声、风雨声、念佛声。我与韦君靖和赵智凤对话，与严逊和冯楫聊天，与杨甲和赵昂发漫步，与文氏和伏氏工匠握手，与逃荒者和供养人座谈……跟他们在纸上的交往中，我收获满满。他们不但让我窥探到昌州五百年的峥嵘岁月，还让我洞悉了人类社会的隐秘变迁。在唐宋广阔的疆域版图上，昌州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但华夏民族不就是由无数的弹丸之地组合而成的吗。任何一个边地小城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发一场铺天盖地的飓风或海啸。

只是，本书关注的重心仅为昌州时期这段历史，书中涉及的大足人文，也限定在伴随昌州兴衰的时间范围之内。对于昌州撤销，大足归入元朝后，以及它在明朝、清朝、民国，直至当下的历史，并未涉及。今后若有契机，兴许我会再写一部书，专门探究大足从明朝到民国这段时期的风云变幻，跌宕时局和烟火民生。

实事求是地讲，写一部书不易，写好一部书更不易。由于记载昌州的史料阙如，要想全面而详尽地反映昌州的人文状貌，几乎不大可能。细查已出版的县志，以及唐宋时期关涉昌州的各种文史资料，所载也是只言片语，里面的信息模棱两可，这给我的写作带来了难度。目前，收录资料最全的，当数《大足历史文化大观》（重庆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一书，本书中涉及的部分事件和人物，依赖该书为据，在此说明并向编纂者致谢！

近几年，颇为流行为一座城市作传。自从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创作的《伦敦传》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其影响覆盖世界各国。中国作家受此启发，纷纷提笔，或自发或受邀为某座城市写传，如《南京传》《北京传》《上海传》《成都传》等。我无意跟风，挤进这支作传队伍中来凑热闹，博人眼球，赚取流量。况且，像大足这个地方，即便有蜚声中外的的大足石刻，也未必人尽皆知。生活在这个花花绿绿、瞬息万变的时代，牵人目光和使人分心的事情委实太多了，谁会对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小城感兴趣呢？故我写昌州和大足，是真心想写，无关乎其他。作为一个喝着大足的水、吃着大足的饭长大的文学写作者，如果我不去写它，难道还指望其他人去写它吗？

最后，我想再啰嗦几句，谈谈本书的写作手法。在决定动笔之前，我的脑子里都是一团雾水，只有写作的念头，却不明确具体该用哪种文体来书写。究竟是采用小说、散文，还是采用诗、纪实文学，抑或时下大受读者欢迎的

非虚构，不得而知。直到在那个下着小雨的午夜，我坐在电脑前，用键盘敲下“我沿着龙岗山拾级而上，漫漶的记忆日渐清晰”这句话时，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灵感的泉水汩汩涌出。那夜之后，我越写越顺畅，也几乎没有考虑自己写下的是什么文体。我唯一的驱动力就是写，写下自己对故乡的触探、体认和感知……当然，这写的前提，全都是基于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文学也是“我思”的艺术，更是“我在”的艺术。只要我写出的文字，能搭建起一条通向故乡的路，至于它是何种文体，已然不那么重要了。为此，敬请读者诸君谅解，假如你们从本书中读出了诗、散文、小说的味道，皆属正常。其实，我真正渴望的，并不是读到本书的人，能从中读出什么文体，而是从我书写的故乡中，能读出或辨认出你们的故乡。从广义上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拥有同一个故乡。

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健在时，曾发誓要写一本能给自己死后垫枕头的书，他做到了，写出了《白鹿原》。我没有他那样的野心和雄心，只想今生能写出一本对自己有所交代的书。不然，纵使写作一辈子，哪怕著作等身，也是遗憾。现在，有了这本《山河故土——昌州文脉五百年》，我的心踏实了许多，宽慰了许多。至少，当我行走在故乡的大地上时，我的脚步将不再踟蹰，身子将不再摇摆，心灵将不再空虚。

面对故土，我永怀感恩。■

（作者系重庆《红岩》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栏目主持：龙 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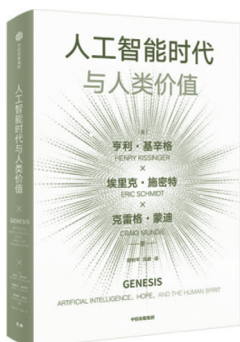
《宇宙的另一真相》

严伯钧 著；余晓帆、张婧 整理 中信出版社 出版 2024 年 10 月版



科普作家、物理学家严伯钧从相对论、量子力学到暗物质、黑洞，用通俗语言拆解宇宙学前沿问题，颠覆常识认知，揭示宇宙的奇妙真相，用生活中的例子和形象的比喻把前沿硬核知识拆解得明明白白。严伯钧联合张首晟基金会及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华人教授共同创作，用物理知识治好你的精神内耗，拓宽对物理学的认知边界，看懂未来 50 年科学发展的走向。全书涵盖宇宙起源、时空结构、量子纠缠、暗能量等多个前沿主题，硬核科普、生动有趣，将高深物理理论转化为大众易懂的知识，激发读者对宇宙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严伯钧以幽默文笔，解读宇宙奥秘，让高深物理不再枯燥，充满阅读快感。”（《环球科学》），是宇宙学普及不可多得的时代佳作。📖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价值》

(美)亨利·基辛格(美)埃里克·施密特(美)克雷格·蒙迪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2025 年 03 月版

2022 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了划时代的飞速发展。ChatGPT 以及 GPT-4 发布，DeepMind 的 AlphaFold 一举解决困扰科学界几十年的蛋白质折叠问题，自动驾驶技术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拓展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以及能力，也使人类也更加重视 AI 伦理和相关法规的制定，2024 年的诺贝尔奖更是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人工智能含量”。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人工智能也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在本书中，基辛格、施密特和微软前首席研究和战略官克雷格·蒙迪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审视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直面人工智能带来的关乎人类生存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如果被迫与机器妥协，我们的底线是什么？在判断如何跟上 AI 步伐时，人类需要更清楚地断言我们与机器的区别。如果不能就我们是谁达成一致，人类就有可能完全把定义我们价值、因此证明我们存在的生存任务交给机器。”

三位作者以高度战略性的眼光，从关系人类社会核心的发现、大脑、现实、政治、安全、繁荣、科学、战略这八个方面出发，探索人工智能将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人类可能的应对方式，以及可行的应对思路，为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捍卫人类价值提供了解决方案。📖



栏目主持：钱 昀

回望黄家垭口的烟火人生

□刘凡君

重庆黄家垭口很多。七星岗有黄家垭口，茶园也有黄家垭口。据说，忠县、巫溪等地也有。我要讲的是江北的黄家垭口。黄家垭口位于原长安公司办公大楼对面。准确地说，是在“丁”字路口那段方圆不到一公里的弹丸之地。

岁月流逝，带不走长安人对黄家垭口沧桑风雨的一片怀念。在人们心中，黄家垭口永远是长安人生命摇篮里的“解放碑”……

（一）

黄家垭口是长安人的解放碑

相传，明末清初有一黄姓大户人家，听说此处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举家从唐家沱迁到此地。

过去，垭口右侧有一条七弯八拐的小巷，巷里有酒肆、商店。每逢关饷之时，到垭口酒肆、商店的人就多了，于是，垭口才有了一丝活气。

1949年底，黄家垭口变化不大，只是多了一些房子，粮站、照相馆、饭店、百货店、副食品店和水果摊样样齐全。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黄家垭口热闹非凡。那时，凡是有工厂的地方，都配有工矿贸易商店。长安厂很大，除黄家垭口外，勤俭村、胜利村、劳动村、黄泥村等都配有商店。

那时，到市中心不方便，没有大桥。要过江，只能去江北城、陈家馆、刘家台乘过河船。不过江，

就上黄家垭口，大人小娃走在一起，上街看热闹。穿了新衣服，在家不自在，上一趟黄家垭口去“现宝”。

20世纪80年代，黄家垭口大兴土木，原来的那些低矮平房全都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楼大厦。但昔日熙熙攘攘的景象却没有，一到双休日，长安人便涌向观音桥和解放碑去购物、打望，甚至连昔日荒凉的五里店也成了火热的地点，黄家垭口瞬间便成了被人遗忘的地方。

（二）

每晚唐酒馆偏偏倒倒走出酒客

唐酒馆在黄家垭口巷子中间。老板姓唐，安岳人。店堂不大，有三四张桌子，但生意出奇的好。酒馆卖的品种很多，烧腊、花生米、红烧大肠、豆腐干等是酒客们非常喜欢的下酒菜。

这里的酒客分为三类，一类是下苦力的石匠、挑挑匠。每天下午，做活做累了，他们便邀三喊四约在一起，到唐酒馆喝二两。天气热，酒馆没有风扇，就脱了衣服干。大家打起光胴胴，喝得二昏昏的，然后打着酒隔，相互骂骂咧咧离开酒馆；另一类酒客大都是长安厂的老酒鬼，出了名的是李酒罐。一下班，他要先在酒桌旁一坐，要二两烧酒，一碟花生米。看见门口有熟人过，便

叫“来喝两口，来嘛来嘛，又不要你出酒钱。唐老板，拿酒杯来”。李酒罐喊张三，张三又喊李四，一张桌子很快就坐满了一圈人。从晚上六点喝到十点，一结账，包包却没钱，不要紧，先赊到，关饷时一齐结。每天晚上，从唐酒馆出来的酒客，没有几个不是偏偏倒倒的。

第三类酒客是酒馆的过客。关了饷，要打牙祭，买一个猪耳朵或切一坨槽头肉带回去。家里来客人，没有好酒菜，也到酒馆买点下酒菜。我父亲喜欢喝酒，但不习惯坐在酒馆喝，于是就买了菜，打二两酒回家独饮。

唐酒馆的酒，最好喝的是“五加皮”。每逢过年过节，酒馆的“五加皮”销得很快。平时，大人喝酒，娃儿好奇，趁老汉不注意，用筷头儿蘸酒，放进嘴一抿，辣得直叫。“五加皮”好喝，像喝糖开水，那时的我就和许多娃儿一样，常盼过年，就想喝一口“五加皮”。

(三)

母亲的遗言与泡菜坛有关

长安人有些不明白，为何把豆花馆取名为“湘江”。

豆花馆位于黄家垭口十字路口。下马路，走一条小道，左手边，再下五步梯坎，就是享誉江北的湘江豆花馆。

门上几个招牌字毫不醒目。字迹模糊，也非名人大家所题。店铺是木门，店内不大，干净，置三五张桌子。厨房正对店门，敞亮。进门的右手边是收银台兼出菜的地方。

那时，每当放学回家，路过豆花馆，总见店内宾客满座，闹哄哄的，吆喝声、划拳声、争吵声，声声入耳。豆花的香味穿过人声鼎沸的人群，直扑鼻腔，令呼吸停止，心旷神怡！

豆花令人羡慕。每到中午时分，人们么五么六叫上一碗米饭，一碗豆花，一碟辣椒佐料，便

慢吃慢喝起来。

但更令人向往的是，这儿的回锅肉炒得出奇地好。听人说，豆花馆的回锅肉是招牌菜，材料正宗。厨师是一个大胖子，一双手生得灵巧。切菜只听刀声不断，如乐声般悦耳。

一天，家里来客，中午无菜。母亲叫我到豆花馆端一份回锅肉。拿上碗，带上钱，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飞奔出门。来到豆花馆，人多，排队。最忧心的是听见那位胖子厨师说回锅肉不多了，心顿时冷到极点。前面还有五个人，我一边看厨师，一边看前面人走动的情况。也许是上帝可怜我，胖厨师手下留情，把最后的希望留给了我。窗口很小，很高。我踮起脚尖把1.5元递进去……

回家路上，端着香喷喷的回锅肉，我心情无比激动。双手捧住大碗，低下头，闭上眼，享受回锅肉热腾腾的无穷魅力。实在忍不住了，拈了一块放进嘴里，残忍地让它停留在口腔，很久都舍不得咽下去。

母亲在家门口等着，我加快了脚步，小跑起来。哪知一块石头绊了一下，我扑倒在地，两眼一片黑。好一阵，我睁开眼，母亲正赶到身边，问：

“儿子，摔到哪儿了？”我手上还捧着大碗，像战士捍卫枪一样。只是里面的回锅肉几乎没有了。我沮丧地说“回锅肉没了！”母亲说得云淡风轻：

“肉没了就没了，只要人没遭！”母亲牵着我回家，我一步三回头，望着回锅肉“献身”的地方，心中还有些许遗憾。

多年以后，时常想起湘江豆花馆的回锅肉，也时常想起母亲说的那句我认为很有文化、也很经典的话。其实，母亲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她有朴素的思想，她说的是百姓的话。她离开人世的时候，最后的遗言是“泡菜坛子该加水了”。就凭这，母亲在我心里很伟大！

（作者系原大江集团公司宣传部部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老镇远上白云间

□李 晓

冬日早晨，何老大给我打来电话，邀我去老镇看雪。何老大满是兴奋的语气，他说，快来快来，下雪了下雪了，雪大得我眼睛也睁不开了。

我如约前往。在老镇沿途的松柏山林，枝桠上披挂着团团白雪，山风拂过，雪团簌簌而落。到了老镇，何老大给我换上一双登山鞋，平时黝黑参天的山林俨如林中高墙，而今换作茫茫白雪的装扮，恍惚间以为是天上白云飘飘洒洒降落林间，让大地多了一份温柔缱绻。

山的造化，往往是大地之上富足能量的赐予。所以我喜欢去山中听泉，去林中煮茶。这老镇山野，是我生命能量的蓄积之地。

在老镇旁边，有一条昼夜欢唱的山溪，清冽溪水中，有大白鹅在溪水里啄食，不时弯过头来不停啄着自身白毛。那条小溪叫青石溪，两岸青石上长满绿藓，那是漫漫时间之水淌过留下的苔痕。我有次问过何老大，鹅啄自身白毛是啥意思？何老大说，鹅是为了清洁自己的鹅毛，啄掉身上

杂质和污垢，保持羽毛干净，也保持羽毛的蓬松，有时也会通过啄食自己的毛来获取其中的营养物质，比如盐分和蛋白质。

我听何老大这样说了以后，对他肃然起敬。何老大是我在老镇结交多年的朋友，那年，我到老镇漫游，认识了还是屠夫的何老大。何老大知道我是一个来老镇东游西逛的“文化人”。有天，何老大在家里做了一大桌丰盛的乡里土菜款待我，还请来老镇上的几个吃货。何老大在家里很少下厨，平时请客就在老镇黎嫂的老馆子里，但他觉得在家里做菜请我吃饭，才显示出对我的尊重。那天，有道菜叫斑鸠叶豆腐，滑溜下肚，顿觉五脏六腑清凉。斑鸠叶豆腐呈现青色琥珀一样的透亮，那是用老家山后的斑鸠叶榨汁过滤，然后辅以草木灰加以凝结成形。我爱上了何老大家的腊腿炖风萝卜、荷叶玉米粑、高粱粑、清炖野生天麻老鸭汤、斑鸠叶豆腐……

何老大对我说，兄弟，我是一个屠夫，结识

你这个“文化人”，是我的福分，只要你想来镇上，随时来，家里有啥可吃的东西，全给你吃。何老大的话，让我动情地起身拥抱：“何大哥，你我之间，做一辈子的朋友！”何老大是老镇上一个卖肉的屠夫，父传子业的一个营生。刚认识何老大时，他眉毛如剑，如今过了60岁，杀气腾腾的眉毛软软耷拉下来，一张笑容柔和的脸看上去像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模样了。何老大而今也没卖肉了，靠着积蓄与社保金足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何老大住的老镇，20多年前是一个建制镇，后来被一个更大的邻镇合并建镇，镇上大多单位也迁移到新镇上去了。老镇如老树，人气枯萎了许多，老镇老房子上的斑驳墙皮如密布老人斑，时常在风中簌簌脱落。

老镇的一条独街呈长蛇状，东街，有17棵水杉树，西街，有21棵水杉树，高耸云天的水杉树，看花了眼，几乎与亮眼白云接壤。这些水杉树，比老镇年龄更长，有的早上百年了。老镇四周，群山环抱中黑压压的松柏树浓如墨汁，也有槐树、杨树、榕树、樟树、光皮桦……至于奔跑在林区的动物，獐子、羚羊、山羊、野猪、野兔、猫头鹰、锦鸡，它们在茫茫林区组建成了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族。在老镇林业站工作的严大哥，他也是何老大的朋友，严大哥4年前从林业站退休后，心里还是放不下老镇四周的这片林子，就在镇上买了一处老房子住了下来，每天都要去林区溜达一圈。老房子是老镇曾经作为供销社门市的房子，大青石垒砌的墙体，墙体上还残留几个凸起字体：“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严大哥的妻子，当年就

是镇上供销社营业员，风韵迷人，被镇上人称为“街花”，她所在门市里用来舀盐巴的猪骨瓢，那猪骨就是何老大送去的。

严大哥心里确实放不下那片林子，山里一草一木，一禽一鸟，他几乎都如数家珍。有一次，我身上燥热长了瘙痒难耐的小疮，严大哥得知后，专门托人从老镇送来他上山采撷的一种叫悬钩子的草本植物，嘱我用此草叶烧水洗澡，果然，2天后痊愈。严大哥乐坏了，他给我打来电话说：

“还得相信李时珍啊！”在老镇房子里，我见过严大哥的案几上放着一册1978年印制的《本草纲目简编》，发黄书籍旁，是严大哥喝茶的老瓷杯，瓷杯上有“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字体。

去年秋天，我去老镇度假，在林区山道上，我遇到了跑步锻炼的胡大哥，跑步后，他站在一棵大树下扯开嗓子“喊山”，就是对着群山放松地大喊大叫。胡大哥告诉我，这也是一种锻炼方法，跑步锻炼肺活量，“喊山”也是，它打开胸腔肺腑，与大山相融。胡大哥3年前来老镇买了房子居住，一半时间在城里，披挂着城里烟火，一半时间在老镇，浸润着山风雨露。

有天我与胡大哥坐在苍苍大树下，虫鸣清凉如微雨，山风飒飒似奔涌，感觉林中巨大树冠托起的上方，汇成了波翻浪涌的浩淼大湖。我于冥想中，成为一只振翅高飞的大鸟，在云端上空，我为林海掩映中的老镇于瞳孔中拍下一张清晰照片，我与老镇，就这样在大地上相互辨识确认，相互倾诉衷肠。

（作者系万州区民盟盟员）

遇见一座古桥

□简云斌

那天，偶然经过鸣玉镇，遇见一座古桥。

“鸣玉”，名字很好听，属重庆市南川区，是个藏在丘陵深处的小镇，位于凤嘴江与龙川江交汇处。凤嘴江、龙川江是两条不大的山间溪河，称“江”有些夸张。据说，二水汇合处曾有一石如牛，流水击石，似玉铿鸣，故得名“鸣玉”。鸣玉镇毗邻涪陵地界，以前是有名的古镇，但现在已看不出多少古味。几条不长的街，街上多是日杂店、农机店，也有几家电器店，还有个菜市场。这天不逢场，街上人不多，有的在打麻将，有的在晒太阳、聊天。

我们肚子饿了，找遍场镇，终于找到一家“土鸡米线”。老板是个年轻姑娘，戴着眼镜，一脸诚恳的笑容。

我近年对古旧建筑比较感兴趣，便顺口问道：“镇上有啥老建筑没有？”

她想了想，答：“有座盐巴桥，不知算不算？”

我忆起老友程兄老家是鸣玉的，他在文章里似乎写过这座盐巴桥，更感兴趣了。一打听，盐巴桥就在距米线店百米开外的下场口。但人站在上场口，视线受房屋遮挡，不容易发现下方还有一座桥。幸亏，我没有错过它。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单孔石拱廊桥。

走近桥头，第一眼看见的是木廊上悬挂的匾，题着三个金色大字：靖安桥。匾尾两排小字注明：始建于清咸丰五年即公元1857年，复修于2005年。原来，它本名“靖安桥”。

询问旁边一闲坐的老者，得知以前桥廊两边

是摊位，长年有商贩在此售卖盐巴及杂货，遂形成盐市，乡民习惯称之为“盐巴桥”。这里也是川盐入黔的通道之一，当年过往的背夫、骡马肯定不少，可想见其热闹状。

靖安桥是我见过的体量较大的单孔石桥。桥长约40米，宽7米多，高近20米。两侧有陡削的台阶，一侧27级，一侧23级。拾级而上，抬头望去，桥廊愈显高大。桥面和台阶皆由青砂条石砌筑，每块条石宽厚一致，长短不一，最长的一块约4米，颇称巨硕。长年累月，人来人往，青砂条石被磨出深深浅浅的印迹，有岁月沧桑之意。

桥廊为穿斗抬梁式结构，两边各有内外立柱两排，加上横梁、穿枋、栏杆等，构成廊体，屋顶为歇山顶，覆以青瓦。我仔细观察，木廊虽是复修的，但用的是老料，木头经烟熏火燎，焦黄开裂，简朴而不失古旧。

靖安桥最令人震撼的，是它高而阔的单孔桥身，需站在远处岸畔，方能一目了然。桥孔横跨龙川江（也称石牛河），跨径22米，呈典型的半圆形。桥孔、桥面再加上木廊，整个桥身有五六层楼高，与旁边低矮的房屋相比，简直是鹤立鸡群。我在一堵墙上看到一条历史最高水位线，洪水发生在1952年7月16日。从水位线看，当时，鸣玉下半街几乎完全被淹，而靖安桥安然无恙。

靖安桥以前是交通要冲，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如今不当道了，显得有些落寞。桥两侧有几幢老房子，为废弃的商铺，残破不堪，摇摇欲坠。

桥下游10来米，便是凤嘴江与龙川江交汇处，二水合流后称大溪河，经武隆汇入乌江。

时值正午，我们坐在桥上小憩，春阳暖照，微风吹拂，感觉很爽快。旁边，一群孩子在嬉戏，几个妇女在聊着家长里短。看来，靖安桥虽不复当年的繁华，但仍是小镇居民休闲的好地方。

桥旁有块碑，是2005年复修时立的。据碑文介绍，靖安桥修建之前，龙川江上原有一座“达济桥”，后被水冲毁，乡民过往十分不便，洪水期间溺死者往往有之。清咸丰年间，由“乐善好施、忧国忧民的陈永恩，不惜跋山涉水、日晒雨淋、受尽煎熬，四处募捐、八方求匠”，修建了这座桥，取祈求安定繁荣和平定洪水之寓意，名曰“靖安桥”。

陈永恩何许人也？我用手机搜了一下：了不得，此公乃晚清时当地一位造桥大师，蜚声四乡八里！

据史料载：陈永恩是鸣玉场柿子坪（现属石溪镇）人，生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一说生于1819年），为贫寒农家子弟，从小聪慧善学，悌孝争颂。“永恩幼时，事母至孝，割股治母疾，甚传佳话”。其父母早逝，兄弟7人，他总以诚爱相召，故兄弟和睦相处，从无闲言。稍长，随堂兄陈永福致力造桥，技艺渐精，成为一代掌墨大师。中年时，为家乡鸣玉场建靖安桥，继而又建平澜桥，“众皆叹服其桥工谙练”。60岁后，因建南川正阳桥和涪陵龙门桥而名声大震。陈永恩一生在南川、涪陵一带建桥10余座，经常劳苦不受酬，垫资不取偿，终于积劳成疾，于光绪庚寅年（1890年）病故。

龙门桥在涪陵区蔺市镇，我曾见过，但当时没留意修桥者名字。那是一座长170米的三孔石拱平桥，比靖安桥更壮观，桥上有几尊精美的石狮子，是陈永恩亲自雕的。近代开辟川江航线第一人、英国人立德乐经过蔺市时，对这座桥印象极深，曾在日记中写道：“蔺市以有三个巨拱的桥梁出名，上面正在砌三座巨大的石牌坊。”我

见到龙门桥时，它已因三峡水库蓄水而整体搬迁了位置。

陈永恩另一件代表作——正阳桥，位于南川峰岩大溪河上。在募集资金初期，他提出“量力输金，工成取偿”，并变卖自己田产垫纳三百金。工程后期，资金缺口较大，他又四处募资。桥成，人皆取偿获息，他却弃而不取。这座正阳桥工艺很高，有比龙门桥更为精湛的石雕，当时就誉称一绝。可惜，2000年时，由于修鱼跳电站，该桥被淹没，仅在枯水时节露出水面。

而在鸣玉镇场镇上，另一座由陈永恩修建、横跨凤嘴江的古桥——平澜桥，也早已改为公路桥，不复当年旧貌。只有靖安桥大体保持原样，默默立在龙川江上，承载岁月风雨，守护小镇的寻常烟火。

一代造桥大师已离世130多年，乡亲们是否还记得他的名字？

我问旁边几个妇女，知不知道盐巴桥是谁修的？她们茫然地摇了摇头。而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却抢着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是陈永恩修的！”

我很惊讶：“你是怎么知道的？”

男孩骄傲地说：“是我外公告诉我的，他还说陈永恩是个大善人！”

我释然了，真心为民造福的人，桑梓是不会忘记他的。在农耕时代，募资捐款、修桥筑路是在行善积福，是一种人皆赞叹的功德。一座座桥梁，一条条道路，其实是由无数善行筑成的。这种朴素的善行，往往在草根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是上善，也是真善。上善若水，无声无息地浸润世道人心；真善若盐，让尘世生活变得有滋有味。看来，乡民们把“靖安桥”叫作“盐巴桥”，真是叫对了！

这方乡土是幸运的，有一座盐巴桥，还有一个陈永恩。

（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万盛经开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读书人

□陈双吉

爷爷今年90岁，爱看书，探讨国家大事。

爷爷读过两年夜校，认识一些字。但他年轻时是没有时间看书的。爷爷一生都在为儿孙操劳，85岁后才没再去田间地头干重活。住到大伯家没多久，大伯们就在涪陵城里买了房子，常不在老家，我们小一代又嫁人的嫁人、外出读书的读书，所以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人在家的。他也总算有了自己的时间。于是，看书便成了他最大的乐趣。爷爷深感共产党的恩泽——让他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家，切实地感受到社会生活越来越好，所以特别喜欢毛主席，他亲切地喊他毛老头儿。他最爱看的书籍便是与毛主席相关的，什么《少年毛泽东》《毛泽东警世恒言》《毛主席在延安》等。为了让他老人家开心，长大后的我也给他买了些关于毛主席的书，可我自己却是不记得具体书名的。他却翻来覆去地看。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看“毛主席”的书。那年去广东中山么爸家，我们觉得沿海城市新鲜，么爸和杨姑爷每天带我们出去玩。爷爷也去，但每天总会找时间看看书。回涪陵前夕，其他要求都没有，不要衣服不要鞋，心心念念地想要那本杨姑爷从中山图书馆借来的《少年毛泽东》，再三嘱咐么爸回老家时给他带上。

后来，爷爷阅读的范围更广了。去年暑假，

我几乎整个假期都在老家陪爷爷，他问了我好多问题，关于秦始皇，关于唐太宗，关于张学良。我说给他找书看，他偏着耳朵听后，高兴得好半天合不拢嘴，还反复强调要给他找全。我自己的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故只能把堂妹的初中历史教材找出来给他带回去，他当宝贝一样用袋子装了一层又一层，放到从孙儿女们都碰不到的地方。爷爷耳朵不灵光，眼睛却相当好，比我们这些看电脑玩手机的年轻人强太多——对面土头谁在搬包谷、田头谁在割谷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看书是完全不用戴老花镜的。我仔细观察过他看书，看得很慢，而且他看书有个习惯，就是喜欢用手指着字，然后一字一字地大声地读出来。通常我还在睡懒觉的时候就听到他在读书了。每天读书的时间比我这个准备考研的还多。每当读到正义英雄处，正义激昂，几十年的驼背儿都要直了些；读到奸人当道时，激愤慨叹，还要唠上几句以表不满。他还不时地看着看着又返回去看，然后若有所思，罢了又埋头继续或者扭头问我。爷爷比伯伯更爱看书，所以除了像伯伯一样问字音及其字意外，还会问一些稍深层次的问题。爷爷耳朵很早就背了，跟他讲话要很有耐心，而这时的爷爷会更有耐心，把耳朵凑到我跟前，几乎是屏息聆听，以最大限度接受信息，大有俯身贴耳以请

之势。他每个问题都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候问得已是大学生的我哑口无言，自惭形秽。他会自己归纳历史脉络，总结朝代兴亡之道，并映射到当代。比如他看了秦朝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就联想到共产党得天下的原因。他用很简单质朴的语言跟我讲着大道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耄耋之年的爷爷，看完的书都能有条有理地讲出来，比我当年背书应考可厉害多了。每天空余之时，他喜欢到对面村办公室或其他同样老来闲的老头儿家里耍，讲述他看的书。渐渐地有老头儿没事专门到屋头来一起裹两杆叶子烟，听他读听他讲，一上午或一下午，戴上草帽顶着太阳或拄着竹杖踩着斜阳慢慢走过对门那个山坡。还有些认得了几个字儿的便会跟爷爷借书拿回家看。爷爷很乐意借书出去，他说，伟人的思想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熟读撒！但是，借书人若迟迟不还，他就会上门去要，生怕人家给他弄不见了。若是别人没读完便会让对方继续读，若是读完了，便会在对方家里坐上好一阵，一起谈读书心得，然后欣喜地将书带回。我们要是回老家，只要他看到谁闲着没事做，玩手机，他就会笑呵呵地把书拿过来要求我们看，我们也都敢糊弄他，因为囫囵吞枣地完成“任务”后，爷爷会让我们讲述看的内容或者出问题考我们。

爷爷也喜欢看新闻。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便是听伯伯讲，后来买了电视后，每天准时守候新闻联播。我有一点不明白，爷爷耳朵那么背，他是怎么把新闻联播看得如此有滋有味的。我猜，大概是模糊地听加上认不完地看吧。第二天一大

早，伯伯就从老屋过来，与爷爷一起讨论前一天晚上看到的新闻，一起讨论当今世界格局和趋势，津津乐道。不过建军60周年直播阅兵，平时跟他谈天说地的伯伯来找他讨论“国家大事”，一向重“礼数”的爷爷，硬是让人家吃了闭门羹，请了好几次，他眼睛都没离开过那20英尺的屏幕，我们跟他说话，也完全没听见，还不时地自言自语惊叹道：这个中国的军事才好喔！跟我们这些成天刷娱乐新闻的大学生讲起的时候，自豪地笑得露出光牙床。当然，更引人注意的是那双深邃发光的眼睛，如老屋门前倒影着中秋月亮的水井。

村里人也有笑他庄稼人不农谚桑麻，偏爱看书关心管不住的国家大事，但也有过路喝水人竖起大拇指夸他精气神好的。的确，他与众多老年人是不一样的。他与我们交流思想并没有什么代沟，更多时候他比我们考虑事情更加周全。爷爷一生经历太多，这世界对爷爷绝算不上温柔以待，可至少在我的20余年里，几乎未见他发过脾气动过怒，从未听过他抱怨过谁，与谁结过仇吵过架，我曾对他的无穷宽容无法理解，甚至因为某些事替他愤怒和不值。而他始终都如那大海，纳百川，容万物。

暑假那个傍晚，夕阳下，晚风中，五岁的小鱼鱼和三岁的小多多追着踩蚂蚁玩，坐在屋檐下的爷爷平静道：“随它自己嘛，莫去踩它！”诧异之余，我又看到了他那似水的目光。

妹妹说，心里有世界的人才会如此豁达，宁静，慈爱。

我想，是的。☞

（作者系涪陵区民盟盟员）

遇见重庆夜色

□袁保亮

从南岸过桥经江北回渝中，适逢夜幕降临。

重庆主城的夜晚，灯火璀璨，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观夜景，可上高山，可行桥上，可游两江，可入洞府，可逛商圈。

重庆名山甚多，主城亦然。缙云山稍远，如黛山色于灯火中，恍如无数的小桔灯照出的光明世界。黛湖如同含羞少女，静静地依偎在缙云的怀抱里。南山更近，一棵树观景台，历来为游人乐道，身临高处自有登山小渝的立体观感和宏阔视角，两江四岸灯火尽收眼底，只见一派辉煌灿烂，如流动的锦缎，彩色的流瀑。

作为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城市，重庆素有桥都美誉。东水门大桥、朝天门大桥、渝澳大桥、嘉陵江大桥、千厮门大桥、重庆长江大桥、黄花园大桥、鹅公岩大桥、曾家岩大桥、红岩村大桥、嘉华大桥、郭家沱大桥、白居寺大桥等多座大桥似当空彩练，若五色长虹，无论造型、结构都各具特色。公交轻轨穿梭其间，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华灯初上，桥上行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凭栏而望，远处的山色和近处的风景尽收眼底。

俯瞰桥下，游船在光与影的斑斓夜色中前行。重庆的两江游近来更加火热，朝天系列、交运系列飞速发展。据公开资料介绍，“两江游览线路航程约16公里，游览时间约45分钟左右。”湖广会馆古文物建筑群、重庆外滩的南滨路饮食文化一条街、空中载人过江索道、佛教僧尼同庙的慈云寺以及解放碑中央商务区、歌剧院、科技馆、吊脚楼等一应景色，现代与古典互为交错。长江和嘉陵江在火热鼎沸的人声，在江湖汉子的豪情和火辣妹子们的热情里生生不息。

洞和府也是各有千秋。有的府第和食坊酒肆交错其间如杨记隆府，有的洞府则相对自成一体如洪崖洞。今日车从千厮门大桥一路驶来，洪

崖洞依山壁立的吊脚楼在明丽温暖的灯火里闪着光。洪崖洞临河浴火，柔和的河水与温暖的灯火融为一体，毫不违和地融入茫茫夜色。还有在洞子里的老火锅店，老洞子火锅飘出的香气和缭绕的雾气，在灯光下又添一派朦胧。

主城的商圈星罗棋布，比较早一点的如渝中解放碑、江北观音桥、九龙坡杨家坪、南岸南坪等商圈，犹如繁星皓月，妆点美饰主城夜色。今夜的月色虽不明朗，但商圈的人潮应不会早早退下，就像解放碑的钟声，虽然敲不敲天都会亮，但是周末总会冷寂得晚点，周末的都市夜色历来如此。三教九流，七十二行，都在这夜色里。喝茶行酒，宴饮作乐，小吃还是饕餮，大多随意不用勉强，一份惬意胜在自然。当然也有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笑语喧哗，声浪阵阵，更显心潮逐浪高。

因着周末之故，交通十分拥挤，见证着都市的繁华。同行阿文说一般重庆人会让道，周末车辆少开。但是今天在大车面前等待了却不能让道，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车。这就是重庆的交通特色和多数重庆人的个性。更多时候，重庆人在不同的岗位，在白天或夜晚，以各种身份各自忙碌，各生悲凉欢喜。烟火气江湖气书生气英雄气在这里演绎，输了赢了苦了乐了报了算了聚了散了都是常态。无论开车到家还是步行回家，回到家哭了笑了天明过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去奋力拼还是去慢慢品，重庆和外地的朋友都是一样的，道理也是相通的。重庆人欢迎外地朋友来重庆，一如认同重庆原住民外出历练。

重庆主城的故事绵长悠远，夜景五光十色，龙门阵摆了又摆，坝坝舞跳了又跳，正所谓长夜漫漫不觉晓，暖风微微人未老，庭院深深子规啼，霓凰熠熠品自高。

（作者供职于市教委，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三苏祠

□何军林

北宋离我很远
躲在千年之外的某个地方
比如一卷泛黄的史书中间
但眉山离我很近
似乎只有一首诗的距离
在春江水暖的季节
当一群鸭子从水面游过
当竹林外开出两枝桃花
我已经站在三苏祠的大门口
此时游人如织
却没人向里通报
我带着行囊和诗篇慕名而来
想拜访苏轼

还有他的父亲苏洵
还有他的弟弟苏辙
走进红墙环抱的中式庭院
那是荷池与小桥
那是翠竹与楼台亭榭
猜想苏轼和苏辙的童年
到底跟蛙鸣有关
还是充满苏洵的呵斥与教诲
穿过木假山堂、来凤轩
邂逅迷人的披风榭
打望溪畔东坡盘陀坐像
模仿苏东坡的样子
把飘逸的长髯变成一首诗
问一声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就这样告别三苏祠
北宋依旧离我很远
我的诗篇还蛰伏在行囊里

（作者系《重庆科技报》副刊主编）

过大源祥博物馆

□祝绘涛

拴马桩还在
但是它已拴不住任何一匹马
甚至那些来去不羁的风
一扇扇的门排列着
从雕刻的镂空图案缝隙
我们看见灯影、绸衫、长裙
觥筹交错的宴会已经零落
夜风中，似乎传来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浅唱低吟

匾额悬在头顶

褪色的金粉极力托举昨日的荣光
肃穆的牌位
延续的不仅是姓氏
还有一个家族的源流
古老的廊门青藤漫生
隔着无形的时间之盾
里面，是渐行渐远的历史
外面，是伫足沉思的我们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民盟画院丙午迎春美术书法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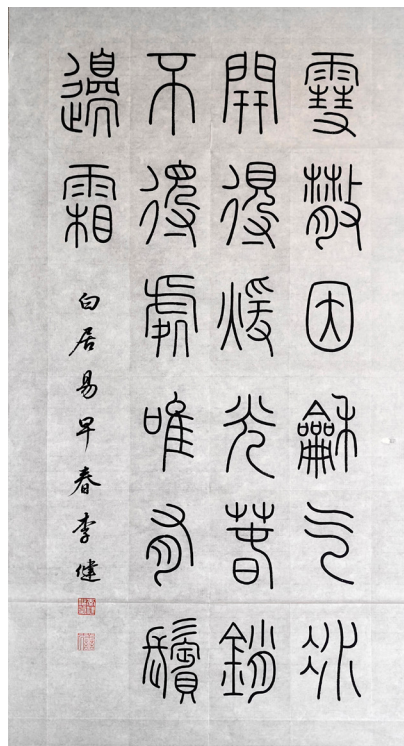
刘剑 / 油画《鲜花盛开的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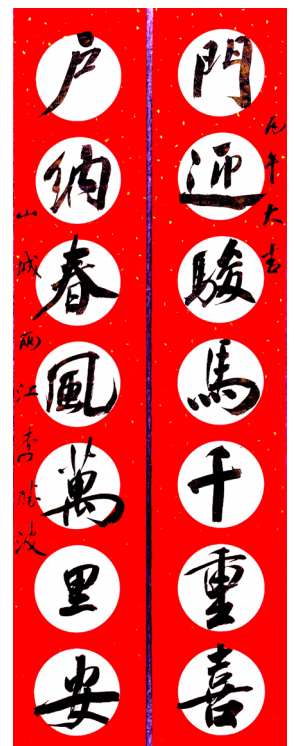
王明国 / 国画《太白岩公园写生之一》



田仁毅 / 工笔重彩《侗韵蝶影》



李健 / 篆书《白居易诗早春》



李胜波
《门迎户纳联》

中國民主同盟重慶市委員會



剪纸 / 粟未希 / 石坚其志、丹鉴其心
(民盟盟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足剪纸第四代传承人)